

从中山党史 看群众路线

黄春华 谢长贵 编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黄春华, 谢长贵编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18-08843-3

I. ①从… II. ①黄… ②谢… III. ①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0125号

CONG ZHONG SHAN DANG SHI KAN QUN ZHONG LU XIAN

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

黄春华 谢长贵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李锐锋 吴锐琼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装帧设计: 陈金花

封面绘画: 林玉婷

出版策划: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

策划: 吕斯敏 何腾江

电话: (0760) 89882926 (0760) 89882925

地址: 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 中山日报社7楼 (邮编: 528403)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编: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佛山市高明领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8843-3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136千字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760) 89882925 邮购 (0760) 89882925

序

为了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中山市党史工作在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及以史资政上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今年中山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伊始献给党的一份厚礼！它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深刻理解、锐意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间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提供了较好的党史参考和理论指导。

中山是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重要城市。自1921年党成立以来，在中山这片热土上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优秀党员，有的党员或党史事迹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传播着正能量。在中共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山籍的苏兆征、杨殷、杨匏安和林伟民在全国都是风云人物。其中，苏兆征和杨殷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简称“双百”人物），再加上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中山便有三位“双百”人物。

在土地革命时期，首任中山县委书记李华韶领导了卖蔗埔起义，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较早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在广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林鏘云、刘田夫、欧初、梁嘉、谢斌、谢立全、刘向东、谭桂明、周伯明等同志领导的珠江纵队，饮马珠江，纵横岭南，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与日寇殊死搏斗于南海、番禺、

中山和顺德之间。在中山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珠纵在五桂山区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老百姓由衷地称其为“小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人民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1955年，在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两篇来自中山县的文章被毛泽东主席批加了按语。一篇是梁祥胜的《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毛泽东在按语中称赞道：“可能某些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还比不上他。”另一篇是介绍新平乡（今民众镇）梁碧南等团员组织的“青年突击队”，毛泽东更是不惜笔墨，夸奖他们“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20世纪60年代，沙溪圣狮异军突起，短短几年便积累了庞大的集体资产，在当时的广东成为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伊始，板芙里溪创立的“联产到劳责任制”曝光，里溪获得了“广东小岗村”的殊荣。李汉章领导的小榄永宁集体资产高达数千万元，荣居全国十大富村之一。1980年底建成开业的中山温泉宾馆也是一面旗帜，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作旅游企业，更由于邓小平同志1984年在温泉宾馆旁的罗三妹山说出“不走回头路”的铿锵之言，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一个重要关节点的见证。20世纪80年代，中山以强大的市属企业“十大舰队”广为世人瞩目而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到21世纪初，中山十多个专业镇如同十多张名片在广东、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着影响。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中山同样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普通党员、基层干部和群众。在这片热土上，有方群英、谢月香等数不尽的将青春岁月献身于发动群众起来救国的仁人志士；有谢嫂、贺婶和杨伯母等为抗日救国舍生忘死的堡垒户；有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般感人的铁流十二勇士；有袁炳煥、任成秀等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的基层干部；有陈洪满、梁锐文、欧阳伊、林志昂等数不尽的一心为群众谋发展、有坚持、有创新的基层党员干部。正是他们让中山党史变得厚重，变得凝炼，在伟人故里不断地续写着“敢为天下先”的篇章。

《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一书立意深远而新颖。虽然只是从中山党史的长河中撷取几十朵浪花，但让人读起来感到亲切，无论新老中山人，都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有着对中山发展的共同期待，在乡土情结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另外，以中山党史作

为解读的素材，更易于让广大的党员干部理解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路线。

《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一书以中山党史为主要素材，但同时从理论上大处着墨。在本书九讲中，每一讲都以我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阐述为起点，此外还引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群众路线的心路历程，读起来让人震撼。此外，《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还引用了其他城市领导干部运用群众路线方法的例子，如第三讲引用的《一篇文章对我的帮助》，对中山的党员干部有深刻的启迪。《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每篇引用的中山党史材料后面进行一番评论。不少评论视野开阔，如对李汉章的评论，就拿他与江苏省华西村的吴仁宝相比，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一书颇为严谨。一是结构严谨。九讲体现了密切的逻辑联系：思想上具备群众路线，行动上体现群众路线，内外环境保障群众路线。这三个方面与群众路线的内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相一致的。二是行文严谨。所有引用的中山党史素材都有明确的出处，而且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公开出版的图书和报刊。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群众路线，一定要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27个小标题全部由俗语组成，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原则。

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业已蓬勃展开，希望中山市广大的党员干部能从本书吸取营养，进一步从理论、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不同层次去丰富中山党史，让党史资政育人工作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要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组织与中山全民修身行动结合起来。做到力传承，讲修身，促和谐，谋发展。不断发扬中山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志存高远，自强不息，意气风发，团结和谐，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和美家园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讲 群众观念 行动先导

- 第一节 篱笆扎得紧 野狗钻不进 /4
- 第二节 猛虎不处劣势 雄鹰不立垂枝 /11
- 第三节 不要骑两头马 不要喝两头茶 /16

第二讲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 第一节 秤砣虽小 能压千斤 /26
- 第二节 不下水 一辈子不会游泳 /31
- 第三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37

第三讲 关心群众 关注民生

- 第一节 百闻更要一见 /46
- 第二节 铁肩担道义 为民鼓与呼 /50
- 第三节 四两拨千斤 一木支危楼 /55

第四讲 宣传群众 凝聚力量

- 第一节 滴水加入江海 方能成为波涛 /65
- 第二节 若要人下水 自己先脱衣 /69
- 第三节 好舵手能使八面风 /75



第五讲 组织引导 发动群众

- 第一节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 /84
- 第二节 众人拾柴火焰高 /90
- 第三节 一个好汉三个帮 /94

第六讲 服务群众 鱼水情深

- 第一节 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 /101
- 第二节 你是风儿我是沙 /108
- 第三节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113

第七讲 师尊群众 问计于民

- 第一节 要知山中事 乡间问老农 /120
- 第二节 撒网要撒迎头网 /125
- 第三节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131

第八讲 依靠群众 自我服务

- 第一节 船头坐得稳 不怕风来颠 /140
- 第二节 事成于和睦 力生于团结 /145
- 第三节 解铃还需系铃人 /149

第九讲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 第一节 月有阴晴圆缺 /158
- 第二节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163
- 第三节 打铁还需自身硬 /168

后 记 /174



第一讲

群众观念 行动先导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首先就要具备群众观。如果脑子里没有群众观念，只有自私自利或精英观念，群众路线是断然走不出来的。所谓群众观，指的是党员干部自觉地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党员干部为什么要具备群众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党执政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陈毅元帅曾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实质就是群众史观。

与群众史观相对应的是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夸大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认为主宰历史的是杰出人物。由于受到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现在媒体上有一些人动辄以“精英”自居，有学者似是而非地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



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公开否定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其危害就是导致了工农大众在改革大潮中的日益边缘化，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群众”的内涵？改革开放以前，说起“群众”，人人都知道指的就是工农大众。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不断崛起，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代表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与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执政基础即工农群众不断分化，形成了一个包括固守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他们逐步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代表的声音也有不断减小的趋势。

与此相联系，一些人谈“群众”，在不知不觉间越来越指向中间阶层；谈民主，则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工农大众，实质上并未脱离精英意识。尽管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形势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工人农民作为群众主体并没有改变，而坚持群众主体地位恰恰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核心。

第一节 篱笆扎得紧 野狗钻不进

所谓立场，表面意思，就是你所站立的场地。引申理解，就是你在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时到底站在哪一方。群众立场当然就是站在群众一方。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坚定的立场，就是扎紧的篱笆，“立场坚定斗志强”，一个人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经常可以从其言行上清楚地看出来。有学者曾说：“12亿农民和下岗

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现状的维持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说话。

当然，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各阶层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持什么立场的要求就非常明确了。毛泽东说：“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从党性的角度来讲，共产党员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不可分的，这在我党数十年历史上早已成为共识。当河南一位官员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雷语被高分贝地传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被雷翻，原因就在于他破坏了党性共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人民群众立场，他也就徒有其表，失去了珍贵的内在党性。

【案例】

活在群众心里的党员干部李汉章

1980年5月20日，一个永宁人永远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日下午，永宁大队召开党员社员代表大会。

原永宁大队支委何经伦：“近千人在开总结大会。我们年年都是，五月左右，收获了甘蔗、摘了茶薇花，收获了香蕉，那就开始开总结会。开总结会才知道今年分多少钱一份。”

当时李汉章在台上发言，不够



李汉章



15分钟，意外就发生了。

原永宁大队支委麦铨荣：“（他）先说完农业，再转上工业，一转上工业没说到几句话，他说‘拿油来’三个字，接着就这样低下头。我在他身边，我抬起他的双脚，马上找人把他抬到长椅，躺在那里，两三个人按他胸部，按来按去都不行，按着按着，救不回。”

群众娟姨：“没多久，那些车就从四面八方过来，广州、石岐等地医院的急救车过来都救不到他。”

原小榄公社党委书记简庆华：“当天我恰好不在人民公社，我去了广州。我一回来大家就说李汉章出事了，周云书记说的。我马上去脱水菜厂，医生在现场抢救（李汉章）。医生当时说（他）不行了，我说不行也要行，再跟我搞几个小时的抢救，把他救醒。说是这样说，但他眼睛的瞳孔都散了。”

原永宁大队支委李英权：“他这种病，急性心肌梗塞，没办法。”

就这样，李汉章走了，年仅52岁。当时，李汉章的最小的女儿李笑英正读初一。她放学回家，见大队的人匆忙跑来找她妈妈。

李汉章女儿李笑英：“我当时也不知发生什么事，我就马上去自留地找我妈妈去。我妈妈回到家后，她们就告诉妈妈，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原永宁大队支委李英权：“他去世之后，群众都哭，有些说父母去世都没有这么凄凉。”

而最令人痛心的是，当大队一班干部为李汉章遗体换衣入殓时，翻遍了他的衣箱，也找不到新衣服。

李汉章太太吴爱群：“衣服都没一件穿的，穿了公社发的裤子去世。”

当干部群众获悉这位鞠躬尽瘁，为集体创造巨大财富的人竟连一套像样的装殓衣服也没有的时候，个个都难过得流出了眼泪。

当晚的总结宴，到会的党员干部和社员代表连饭也吃不下去，一片呜咽声，全村不约而同地关掉电视机、收音机，肃静地为他致哀。李汉章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干部群众主动捐出2400元为李汉章办丧事。

李汉章女儿李笑英：“他去世后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去拜祭他，因为我们当时很少外出，放学都是呆在家里，那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伤心的，因为他平时回家都是有说有笑，有时街坊一听说他回来就过来坐，围着听他说从会议上带回来的消息。”

原永宁大队支委李英权：“当时有很多过来的人我也不认识，外省的也有，有些国家干部也有来，有些人的心情比死了爸爸还惨，我们也流出了眼泪。”

当时，县社领导、兄弟单位、永宁村干部群众2000多人参加追悼大会，很多人都戴上了黑纱，送的花圈有390多个。追悼会上，小榄镇同乡会的一副挽幛上写着“痛失英才”四个大字，道出大家悲伤、敬佩的心情。

原小榄公社党委书记简庆华：“李汉章去世，他的花圈摆起来应该有一两公里长，永宁人民十分怀念他。”

“宁失黄金千万两，不愿失去李汉章。”李汉章逝世之后，大队有人编了这样的咸水歌来赞颂他。据说，这位赞他的人，正是20年前骂过他的社员之一。

群众为了怀念他，为他定制了一个半身瓷版像，至今仍然放在永宁居委会的办公楼。李汉章生前廉洁奉公，逝世后只留下一间瓦顶的窄小平房。1985年，区、乡、村三级共筹款2万元，为他家建了一幢新楼房。到20世纪90年代，永宁村委再次为他家建新楼房。

李汉章逝世之后，他女儿李笑英到大队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



李汉章女儿李笑英：“（港商）送那些电视给他，送了几部给家里用的，但直至他去世后我们家也是没有电视的，后来我们才知道群众说他将那些电视以（送电视给他的）港商的名义捐赠给生产队，他去世的时候每个生产队已经有电视，我们家却是很迟才有电视的。”

一张残旧的椅子、一条扁担和一个图章，这些就是李汉章留给世人的全部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却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原永宁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梁卓勋：“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为永宁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二个就是留下了很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精神主要是无私无畏。”

群众梁伯：“永宁是有了他才发展到这样，他找到钱就积累起来建大厂来养活群众。”

群众张姨：“他做开荒牛。他不开荒，不去带动，永宁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处？”

原永宁大队支委李英权：“如果他这个人不是这么忠直，这么艰苦朴素，永宁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快、搞得这么好，所以我很佩服他。”

原小榄公社党委书记简庆华：“他为小榄的发展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带头的作用，引路的作用，三个作用都起到了。”

原永宁大队支委胡球恩：“改革开放到现在，他的路子，二十多年来都适用，现在还在继续走。”

原永宁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梁卓勋：“主要是走出了一条从单一搞农业逐步走上农工副综合发展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贯彻，他就知道自已的路是走得对的，所以很高兴。”

原小榄公社党委书记简庆华：“我在任（1976—1980年）期间，永宁工农业产值已经占了小榄人民公社整个产值的三分之一，没好

的班长，就没有这样的成就。他得到这么多永宁干部群众的支持拥戴，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书记，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群众当中了。”

原永宁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梁卓勋：“他经常这样去教育干部、群众：要照顾国家，照顾集体，也要照顾个人。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留一定的公益、公积款项，拿来搞建设，譬如学校、医院、桥梁、道路、群众福利等。国家任务我们年年都超额完成，个人收入也逐年增加一些。我们反对分光吃光，强调留积累去搞建设，通俗些说就是把母鸡养好，然后拾鸡蛋。”

李汉章女儿李笑英：“爸爸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如何做人处事，即出来工作凡事都要用心去做，要脚踏实地，不要样样都靠关系，因此我们由小到大都不会因为我爸爸曾经是书记而样样靠人，依赖别人。”

原小榄公社党委书记简庆华：“为官一场，就要为民办事，不然你做官有什么用呢？李汉章就留意这一条，自己贫苦出生，就为贫困的兄弟姐妹办事，就要搞好家乡。李汉章这种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永宁人，像后来何泽权接班，再后来方耀晃接班，到现在屈桂添接班，代代相传。”

李汉章离开了之后，永宁继续沿着他的路子走下去，1980年，永宁大队工农业总产值1700多万元，被誉为千万富村。

1983年，永宁开办了制衣厂，接着五金厂、电器厂和彩印厂相继开业。当年永宁社队企业收入1712万元，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天津市大邱庄。

1984年底，小榄镇第一家合资企业——永大（中山）有限公司成立。

1988年，永宁村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7亿元，成为全省最早的“亿万富翁”。到1998年永宁村委会已经年产值10多亿元，拥有10



亿元的集体家当，户均分配3.6万元，为全国最富裕的村委会之一。

原永宁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梁卓勋：“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影响着 we 接班的这些同志，因此永宁可以继续前进。由于有了他的那种精神，所以我们永宁集体的经济可以得到巩固和发展。他对我们影响很深，可以说他虽然去世了，但仍然活着，虽死犹生，群众在心底依然是很尊敬他的。”

（摘自小榄电视台《党员李汉章》解说词，文字略有修改。）

【点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尽管几十年风云变幻，提起当代中国屹立村级经济潮头的领军人物，从屹立时间之长，发展之巨及影响之大等诸多方面考量，应该非华西村的掌舵人吴仁宝莫属。然而，小榄永宁的启航者李汉章也不遑多让。李汉章、吴仁宝分别于1954年、1957年当上村支书，起点相近，都是历经风雨，一路走到改革开放。到1980年，永宁的实力要超过华西。可惜天妒英才，天时、地利和人和俱佳的改革开放伊始，本可浓墨重彩描绘的蓝图尚未展开，李汉章竟鞠躬尽瘁，过早离世，真正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留下了“宁失黄金千万两，不愿失去李汉章”的咸水歌在中山一隅悠悠传唱。

李汉章开拓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所站的群众立场极为坚定。他立言：“社员比干部先富，这是当干部的光荣；社员不富而干部暴富，这是当干部的耻辱。”他更践言践行，数十年如一日，始终认为群众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他的坦荡与无私甚至感动了“反对派”，使他在“四清”和“文革”中始终屹立不倒，给“身正不怕影子斜”下了完美的注脚。

第二节 猛虎不处劣势 雄鹰不立垂枝

是猛虎，就会抢占主动权；是雄鹰，就会长空放巨眼。决定它们凶猛行为的是进攻的态度。态度决定行为。所谓态度，就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态度。立场通过态度表现出来。一个时髦老太在公交车上嫌农民工衣服脏，骂他“影响市容”，从而引发争吵。突然一个小学生说：“如果没有农民工，就不会有我们城市里的一切。你这么瞧不起他们，他们以后不来建设城市了怎么办？”全车忽然一片沉寂。此事发生于重庆，让人不禁由衷感叹“有德不在年高，无德空活百岁”。其中反映的广大群众对农民工的态度引人深思。

正如立场有群众立场和精英立场一样，态度也有群众和精英之分。就对待群众的态度而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毫不掩饰的看不起群众的精英态度。比如全国著名的某房地产商，向来为房产商鼓与呼。他说：“我是一个商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我不应该考虑穷人。”说得直截了当，丝毫不转弯。

第二种是处于精英态度和群众态度之间的模糊态度，属于中间地带，这类党员干部人数最多。有的骨子里是精英思维，表面上却似乎重视群众。有的领导干部，逢年过节偶尔访问贫困户，问寒问暖，体现关怀，但在平常的更多时间里却不愿放下架子，不愿同群众多沟通多联系。有的真心提倡群众态度，但却有着割舍不了的精英情结，以致于经常摇摆于两者之间。

让更多的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端正群众态度，就要让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不断剖析自己，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落到实处，真正完成思想上的入党。一个党员干部的群众立场和态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不断的努力才能形成的，即使伟大如毛泽东也不例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这样剖析过自己，读起来耐人寻味。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讲得很明确，让他的思想感情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是“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也就是后面我们还要谈到的同群众打成一片。

第三种是真正具备群众态度，此为优秀的党员干部。

【案例】

坦洲老法官梁锐文长期扎根基层， 开庭前尽量实地走访

梁锐文是中山市坦洲法庭法官，自1985年3月坦洲法庭成立开始，他担任坦洲法庭法官已经28载。就在这个周末，梁锐文将脱下他的法袍，结束他的法官生涯，迎来他的退休生活。

在28年的法庭审判工作经历中，经梁锐文之手处理过的案子多不胜数，其中不乏棘手的案子。但只要有条件，梁锐文都会主动去基层进行实地调查，这种方式让他能够了解到争议的关键所在，并做出让人信服的公正判决，让很多已经调解多次未果的案子迎刃而解，也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重与喜爱。在坦洲只要谈起“梁庭长”，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对他交口称赞。

“借”到基层一去就是28年

2013年7月15日上午，照例“巡视”了一遍院子里的树后，梁锐文一如既往地回到办公室浏览完案卷，穿上庄严的法袍，走进审判庭。这是一件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开庭。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在8月11日，梁锐文将满60周岁，这也意味着他将脱下法袍，正式迎来退休生活。

梁锐文是坦洲法庭里拥有最老资格的法官。自坦洲法庭成立那会，梁锐文就扎根在这里。据说法庭院子里的树大部分也是他亲手栽培的。1985年，由于要组织一镇一



梁锐文



庭，当时的中山市人民法院在坦洲镇组建了坦洲法庭，就把在坦洲镇司法办公室担任办事员的梁锐文借调过来，没想到这一“借”就是28年，而梁锐文也没向组织申请过调任，就这样，坦洲法庭法官的身份陪着梁锐文走到了今天。

坦洲位于中山的南部，早年也算是偏僻之地。很多当地的村民对法律的认识并不多，或根本不懂法，很多东西都是靠村里人自行调解，直到梁锐文的到来。由于本身就是坦洲本地人，梁锐文在工作空余的时候，总喜欢骑着自行车，到村庄或学校普法，有时还到果园和田头里为农民讲法律。

渐渐地，坦洲人开始认识这位“梁法官”，每当在法律上或是生活中遇到难题，或者有些事情村里自己调解不了的时候，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梁锐文，而梁锐文也总有办法帮他们排忧解难。

现场走访有助了解案件关键

坦洲水产养殖业发达，但也经常发生一些承包鱼塘的纠纷案件。几年前在一个承包鱼塘纠纷案中，一承包商以鱼塘排水系统不能排水为由，一直拒付当地生产队工程款项，欠下将近60万元的费用，于是生产队将该承包商告上法庭。

梁锐文在接手案件阅读完卷宗之后，便来到鱼塘排水系统处走访。经过详细检查之后，杨锐文发现该鱼塘所有的排水系统都能够使用，只是承包商一直没用，于是他便直接向承包商当面指出，承包商无话可说，只能老实支付生产队工程费用。“承包商只知道我是法官，想谎称排水系统不能用，却不知道我也是务农出身，对鱼塘的排水都了如指掌，这些东西看一眼就什么都清楚了。”梁锐文说。

像这种开庭前实地走访的方法，在杨锐文日常的案件处理中并不少见。每次开庭前，除了阅读案件卷宗，只要条件允许，梁锐文都会坚持去案子的现场看看，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寻找案件中当事

人争议的焦点。

“因为只有到了现场，自己心里才有底，这样有助于自己作出公正的判决。”梁锐文告诉笔者，像鱼塘纠纷、房产纠纷、房屋损坏等类型的案件，实地走访对自己了解案件的关键问题很有帮助。

也正因为经常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梁锐文对坦洲本地很多情况都了如指掌，在解决案件纠纷的过程中赢得了坦洲居民的尊重与喜爱。

主动调查化解被执行方疑虑

去年由于家庭财产纠纷的问题，坦洲镇南祥街的吴某曾被其伯父告上法庭。梁锐文接收案子后，便来到吴某所在的村子里了解情况，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维护了吴某的合法权益。

“梁庭长这个人很好说话，人也很实在。一审的时候，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梁庭长去村子里了解过实际情况。第二次在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时，梁庭长还告诉我不要紧张，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所以我很感谢梁庭长作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每逢跟人谈起梁锐文，即使是平常不善言辞的吴某也变得侃侃而谈。

据梁锐文的同事透露，当地的老百姓很喜欢梁锐文的做事风格，很多村民还“点名”要梁锐文来审案。“当然，根据法律程序，不可能说当事人想谁审就谁审，但这也说明了人们无比信任梁庭长。”曾在坦洲法庭工作过4年的霍先生说。而更让霍先生啧啧称奇的是，法庭经常会有一些带着情绪前来“咨询”的村民，但通过与梁锐文交流，总能带着笑容离开，而且走的时候还不忘轻轻地把房门带上。

对于霍先生的说法，梁锐文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那是2004年之前，我还负责执行的时候，很多案件可能因为客观条件的问题无法马上执行，当事人前来询问，带着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梁锐文



说，“收到申请人的强制执行后，我一般都会主动去调查核实清楚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并将调查结果拿出来给申请人看，申请人见我主动帮他调查，跟进及时，反馈又及时，即使因为客观原因暂时执行不了，他也会理解你的工作。其实，我们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最重要的是你工作真的做到位了。”

（摘自 2013 年 8 月 7 日《南方日报》）

【点评】

梁锐文为什么会成为群众喜欢的法官，这同他的群众态度是分不开的。美国西点军校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人生观论者认为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价值观论者则认为态度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态度决定一个人成功的高度。梁锐文长期扎根基层，自借到坦洲28年，都没向组织申请过调任，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再就是他已养成调查研究、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法官，客观而细致的调查更是公正判断之必需。梁锐文没有精英意识，有的只是法律法规的公正、尊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意识。因此，他无愧于人民法官的称号。

第三节 不要骑两头马 不要喝两头茶

公仆意识是我党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品质，它是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树立公仆意识”、“增强公仆意识”等用语。从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角度讲，“树立”和“增强”等用语都是不够的。“树立”

说明尚未具备，“增强”说明尚未完全具备。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应该是全天候的公仆，时时处处服务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的政治伦理。俗话说“不要骑两头马，不要喝两头茶”，党员干部要完全具备公仆意识，不能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牢记主仆关系、践行执政宗旨，是否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是否恪守为民之责、履行为民之职，始终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内容，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作风是否端正的试金石。”

当然，党建上有“思想入党”理论，将入党分为身份入党和思想入党。一个人加入了党组织，只是具备了党员身份，但思想上并不一定入了党，还需要在思想、在行动上不断改造自己，消除落后的思想意识，从而成为合格的党员。因此，“树立公仆意识”、“增强公仆意识”恰恰反映了不少人有党员身份，而思想动机却不纯的现状。

现在不是过去的战争年代，因此很多党员忽略了“思想入党”的重要性。有些党员骂起党来比非党人士还凶，似乎他和这个组织没有血肉关联似的，政治伦理荡然无存。

对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尚未完全具备公仆意识，你就有可能高高在上，视人民群众为“阿斗”，就有可能漠视群众利益，甚至走向贪腐，彻底腐化堕落。可见，完全具备公仆意识，不仅仅是政治伦理，更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

【案例】

欧初回忆心装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林锵云

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中山县五桂山根据地合水口里剑门牌村向林锵云汇报工作。此前不久，由林锵云担任领导的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从番禺转移到中山，继续领导珠江三角洲腹地南海、



番禺、中山、顺德、三水一带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汇报完工作之后，我向林锵云报告，我与容海云相识已经三年，彼此觉得感情成熟，打算结婚，请领导批准。林锵云笑着说：“结婚可以，不过你要先去弄两斤狼鱼来，请我们吃一餐。否则我当你们两个是‘伪组织’。”狼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通常只有手指大小，味道微辛，价格便宜，在珠江河口区很常见，何况当时海滨的鸡头角、涌口门一带已在我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我便托人买来几斤狼鱼，请林锵云等吃了一餐饭，就算是“喜酒”了。

林锵云当时40来岁，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人都尊称他为“林叔”，大家一向把他当作师长。他处处爱护后辈，将我们放到关键的岗位上，经常督促检查，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能力。他自己虽然在战争年代一直未成家，但对部属的婚事总是非常关心。

林锵云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中共，投身工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派遣回到广东，组织了珠江三角洲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主力，大智大勇，屡建功勋，从而成为当地游击战争的一面旗帜。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又注意照料士兵，因此部队凝聚力很强。他与大家一样铺稻秆睡地铺，战士们笑称是“金针蒸鲩鱼”。1941年冬，我奉命调到顺德西海抗日基地，担任“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第一中队指导员兼代理支部书记，从此长期在林锵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容海云认识林锵云比我早，1939年她在家乡新会县荷塘办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日，林锵云来视察时认识了



林锵云

她，是年7月调她到顺德参加游击队。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几个女同志住在农家旧屋，睡房还要划一个作猪栏，吃的只有桑叶粥、蕉头粥。林锵云专程来安慰鼓励她们，此后又送容海云到路尾围参加训练班，亲自为她上课，讲述中共党史和形势。训练班结束之后，容海云留在路尾围办识字班，住在农民梁伯家里。梁伯五十多岁，有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叫妙珍。林锵云每月来听一次汇报，谈完工作就同梁伯谈天。梁伯每次都拉林锵云坐在门外蕉树下，对河饮米酒。河涌里有很多俗称“螞蜞”的小螃蟹，妙珍捞来喂鸭。螞蜞卵当地人叫“螞蜞春”，林锵云与梁伯用来下酒，边饮酒边谈笑，二人关系十分亲切。

林锵云待人敦厚，威信很高。当时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的领导人罗范群、陈翔南等都比林叔年轻许多，资历更不如他，但林锵云一直十分尊重他们。1939年冬天，延安派出两位红军干部谢立全、谢斌到广东，林锵云亲自将他们接到珠江三角洲游击区，尽力为他们安排生活、工作条件，还为他们当粤语翻译，使得谢立全、谢斌在华南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八区有位姓周的跌打名医，先送子女周扩源、周兰参加我游击队，后来自己也来到五桂山根据地。林锵云打听到周医生的生日，默记在心。到了那一天，林锵云特地找来周扩源与周兰，对他们说：“今天是你父亲的生日，他与我同岁，在部队算得一个老人。你们陪他吃餐饭吧。”周医生为此非常感动，抗日意志也更为坚定。后来周医生被敌人逮捕，受到严刑拷打至无法行走，却依然咬牙回到部队。解放后，林锵云仍然记得周医生，嘱咐老下级在宝安县搬运公司为周医生安排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锵云随广东部队北撤，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到广东工作。有一段时间，他担任的职务与他的资历、能力比较起



来明显偏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临开会前，刘少奇专门请林鏞云、冯燊等两位老资格粤籍工运干部上北京谈话。刘少奇说：“这次没有安排你们担任中央委员。”接着，刘少奇说：“你们两人资格老，工作成绩中央也了解。但是你们长期在远离中央的地区工作，经验少一些，因此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上没有列你们，同时安排的职务可能比资历相当的其他人要低。”林、冯两人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不会计较个人职务高低。事实上，林鏞云无论是在担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期间、还是在1957年担任副省长期间，都做了大量工作。

林鏞云特别关心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每当老区的群众、堡垒户找上门来，他总是热情接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林自己家的粮食也相当紧张，但他照样将配给老干部的粮食及其他食品拿出来，招待乡亲。有次我陪他视察五桂山老区，他见到群众的生活依然很困难，十分感慨，马上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帮助群众脱贫的方案，同时捐出了数百元私人存款帮群众解决困难。我非常感动，也要追随他捐款。他说：“我上无老下无小，你不同，有一大家人口，我捐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鏞云被批斗，继而失去自由，身患重病期间仍被关在一间小病房，于1970年10月含冤去世。我们辗转听到噩耗，不禁悼惜不已。

（摘自欧初《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

【点评】

林鏞云是大名鼎鼎的珠江纵队司令员，他身先士卒、关心下属，爱护群众，公仆意识鲜明，威信极高。机关里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职工面临升迁，要填写政审表格时，里面有一项“政治面貌”，据说

如果是党员，就填“党员”，如果不是党员，就填“群众”。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一入党，就不属于群众了。其实，“群众”这个概念的外延还是比较宽的。我们说，工人农民是群众的主体，并不排斥经理等管理者阶层也属于群众。同样，在军队里，广大的指战员属于群众，叫士兵群众；党员里绝大部分也属于群众，叫党员群众。他们恰恰是我党同广大工农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林锵云做到了全天候工人农民群众的公仆，做到了普通士兵的公仆，甚至做到了全天候手下党员干部的公仆。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二讲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

——习近平《之江新语》（2004年6月）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基层都是第一线。基层是人民群众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具战斗力、创造力的地方；基层是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地方，也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地方；基层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源头，也是检验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实践场所；基层攸关党和国家发展大计，影响甚至决定全局；基层是党员干部工作的重心，更是锻炼、培养干部的沃土。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有智慧，有想法，有疑惑，有顾虑，都要通过交流来了解、表达，不深入群众，就无法知民情、晓民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更无从谈起。为什么如今“交通发达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种“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的现象时有发生？问题就出在一些党员干部没能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尽管现在通讯工具十分发达，联络方式更加多样，



但都不能代替手拉手的亲近、面对面的交流、心连心的沟通。只有真正做到深入群众、融入群众、贴近群众，才能真正摸清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抓准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

一个有理想、有作为、有担当的干部，应当把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作为必要工作。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增强工作的时效性；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密切干群关系；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提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做到“三入”，即心入、身入和融入。

第一节 秤砣虽小 能压千斤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挚的感情。切忌嫌群众穷，嫌群众没文化，嫌群众没素质，这种以高高在上的心态对待群众是要不得的。须知“秤砣虽小，能压千斤”，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将自己看成群众中的一员。只有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中去，将群众当亲人看待，才有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就是“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这与我党的宗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投入真感情的时候，就是他“爱民”的时候。党的优秀干部孔繁森有句名言：“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只有爱民，才能说这个党员干部心里头装着群众，才能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才能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地方改起，才能真心实意地办一些顺民心的好事、得民心的实事、暖

民心的难事，实实在在为民解忧。

一个党员干部是否爱民，通常可以从其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看起来。从人生价值观上说，如果一个人将个人利益放到至高位置，无大局观，无集体观，那么此人不可能真正爱民。从历史观上说，一个满脑子精英理念的人，不可能正确评价近现代史上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爱国运动。比如评论义和团运动，总有一帮人站在精英立场上，只是片面夸大义和团运动的负面作用，却对其粉碎西方诸国急于瓜分中国之梦的历史功绩只字不提。

一位学者公允地评论：“义和团的成分是万千思想不统一、组织纪律性散漫以及极需整合的普通群众，有磅礴伟力但却需要有思想的优秀精英融合指导。可惜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当时的优秀精英却与其分离排斥，故失败无疑。而康梁孙等人由于不接地气，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也断无成功之希望。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一场农民战争，这场战争有最先进的思想指导，还充分地接了地气，其本质为共产党精英与义和团（可作为工农群众的符号）完美地结合，在改造义和团缺陷时也改造自身，从而成就伟业。改革开放后有一帮自号的官商知识精英，不下基层，不接触甚至看不起群众，其中一批人更是言必称西方，这帮人极力夸大义和团负面东西，有意或无意地阻止中共接地气，不断割裂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此为当代既得利益的精英与群众相悖离，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的现实表现。”

一个党员干部是否爱民，反过来，可以从群众对他的感情深浅看出来。群众在党员干部心里的份量有多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位置就会有多高。“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因此，要走群众路线，党员干部必须要勇于自省。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党员干部也同样需要“吾日三省吾身”。要不断地从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反省自己的立场、态度和工作方法，要不断反省自己在群众心目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要多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案例】

感激上山下乡的日子

1968年，家住石岐区的胡叔高中毕业。在父亲的鼓励下，胡叔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来到港口镇的莲花大队进行改造。“那时候，我所在的大队是大沙田区，路很滑，常常跌倒。”从小生活在城区的胡叔习惯了大马路，初来乍到，怎么也适应不了农村里的泥路。“后来，摔跤的次数多了，我也学会了走路。”

在农村的日子里，从小在糖水里长大的胡叔，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不仅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而且还学会了插秧。

在那个特别的年代，物资供应都是必须进行分配的。“按照规



中山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登记表

定，一个礼拜能凭票买到一次猪肉。”按照当时大队的规定，买猪肉必须凭证，粮食则按照劳动力分配，菜自己种，此外，买上两分钱的豆瓣酱可以吃上几餐。虽然物资匮乏，但是胡叔与其他插队知青一样，对插队生活充满了热情。“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干活，直到晚上才回来。不知道疲倦，也没有人抱怨。”

带着虔诚的改造思想，胡叔与莲花大队的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村里一名村民家庭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胡叔不仅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还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帮助该村民。冬天的时候，村里的五保户没有棉被盖，胡叔将自己母亲打的棉被给该老人家送去，而自己盖稻草取暖。

“我们插队时，农民对我们很好，有吃的有喝的，都会照顾着我们，所以我们也特别感激他们。”在淳朴的农村里，胡叔从村民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从艰难的生活中逐渐成长。“插队生活，有苦有乐。锻炼了我们。也让我们明白，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看得到彩虹。”

（摘自2005年5月9日《中山日报》）

【点评】

上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复杂的运动。有理想，也有失落；有欢乐，也有悲剧；有烈火中锻炼的收获，也有地狱中的煎熬之感。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其评价，历来有正反两个方面。反面评价主要着眼于数千万知青本身的悲剧人生，如远离父母、回城遥遥无期、最终回城却遭受歧视等。1991年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胡绳认为：“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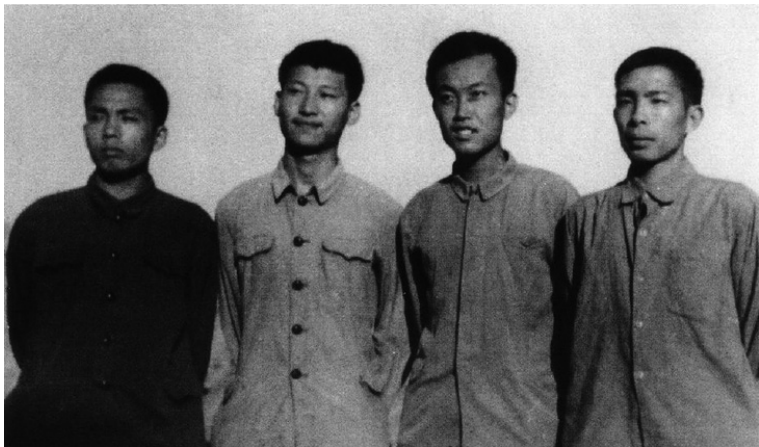
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持正面评价的主要是从干部群众相结合、知识下乡改造农村、下基层磨练自己等群众路线的角度去看。1996年2月22日，李鹏总理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对留在革命圣地的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说：“‘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应该说，这段历史给不少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悲痛的事。对这段历史，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决策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得到了锻炼。你们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劳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精神境界得到提高。正像你们自己说的，受益匪浅。因此，要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文艺作品也要全面反映这段历史。”

习近平在2003年谈到自己上山下乡经历时，他是这样说的：

“上山下乡的经历增进了我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的习近平（左二）

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载于2003年《福建博士风采》丛书第一卷）

前述胡叔之所以几十年后对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念念不忘，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心里完完全全装下了群众，他带着感情真心地去热爱群众，“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群众关心他，全心全意接受他自是情理中事。在干部和群众、理论和实践二者完美结合的过程中，胡叔的心灵自然而然也得到了升华。

第二节 不下水 一辈子不会游泳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最基本的是要亲身走到群众中间去，并能切中要害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就叫“身入”。目前，全国各地



都在流行的“干部下乡”，出发点就是让干部能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少犯或不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错误。

水缸里的皮球浮于水面，难以沉底，这与党员干部“身入”基层群众，颇有点类似。姑且把它称为“水缸里的皮球”效应吧。

第一种情况，逃避下乡。为什么逃避？因为下乡尤其是“脱产下乡”是比较艰苦的事。据说，湖南某市大倡干部下乡之风，并要求干部做到“找得到人、办得好事、解得了难、交得了心”。为了将下乡落到实处，该市还专门设定了一套程序，要求下乡干部必须一丝不苟地履行，遵守下乡的时间要求，完成“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结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干部明明人在城里，名字却赫然出现在数十公里外联点驻村签到本上；厚厚的三本“民情笔记”，也全由基层干部代写。如果说皮球扔到水缸里，即使浮于表面，毕竟还接触到水。而这种假下乡的行为却意味着皮球根本没接触水。

第二种情况，蜻蜓点水。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在工作实践中，除了重要节日会走访慰问外，平常很少与群众有密切的接触，属于“接头干部”，做的是“面子文章”，可谓标准地诠释了“水缸里的皮球”效应。还有的干部在下基层联系群众时，往往以时间紧为由，只让基层自己安排一些各层次的代表来征求意见。当然，也有被基层党委政府设阻，从而联系不上群众，而自己也不想打破这种局面的。由于不能直接联系普通群众，所以干部领导看到的听到的常常不能切中要害，或者不能真实地听到群众的心里话，看不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民情摸不准，就不能把准脉、对症下药，惠民之措施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种情况，似是而非。有的党员干部确实脱产下乡了，也“身入”群众了，但从综合效果来看，并没有打破“水缸里的皮球”

效应。比如，从2012年2月开始，河北省有关部门投入2.5亿元，派15000多名干部进驻到5010个村。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他们的任务是，在帮助农村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此事在开始的时候，被媒体广泛报道，消息几乎铺天盖地，但8个月后，却静悄悄地淡出媒体视野，究竟效果如何？不得而知。给人的感觉有点走马观花，龙头蛇尾。很显然，那么多的干部虽然比较长时间“身入”基层群众了，但“水缸里的皮球”效应并没有被打破。

有媒体一开始就此事评论，听起来不无道理。

作为机关干部，能够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应该鼓励。但问题是，这么多机关干部下乡，且一下乡就是8个月，不怕荒芜了自己的“责任田”？如果真的不怕荒芜“责任田”，这说明，这些干部在机关岗位上是有可无的。既然可有可无，为什么一次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却没有被裁减掉呢？

当然，这次这么多机关干部下乡，是为了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做好维稳工作。不仅投入的人力多，多达15000人，而且财力投入大，多达2.5亿元。投入这么多的资金，让机关干部下乡，能取得多大效益，特别是能否收回“成本”，值得打个大问号。如果没有相应的考核与问责兜底，与其这样让资金没把握地“打水漂”，还不如拿这笔资金为农民群众办几件实事来得划算。毕竟，过犹不及，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就像重庆市南岸区逼干部种地一个月一样，不仅为人诟病，还会事与愿违。

老实说，时下少数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在不断退化，“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时下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让群众纠结。机关干



部需要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也是我党着力倡导的老传统。但任何“四同”都不能一阵风，搞形式主义；否则，除了要曝头，追求轰动效应以外，荒芜了自家的“责任田”才令人忧。

要打破“水缸里的皮球”效应，让皮球沉入水缸之底，就需要有坚强的可持续的毅力和排除一切的阻力。而做到真正的身入群众，除了要具备坚强毅力和排除阻力外，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细致的调研力、不屈不挠的执行力以及对群众的亲和力。

【案例】

三乡雍陌村村民讲述老领导任成秀的故事

在中山日报推出《中山党史人物》系列报道期间，不断有读者爆料提议，应该去看看三乡的一条河流。中山是一个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级市，而中山还有一条以人名命名的河流叫任成秀河，在三乡境内。岁月流淌，这条河和这个人的故事渐渐鲜为人知，但是河水汨汨前行，在不停地诉说着一位老党员、老领导如“大禹治水”般的功绩。



任成秀

一场暴雨过后，三乡雍陌村清新一片，雨水顺着村里的任成秀河穿流而过，汨汨前行，河旁油油的草莓地里，村民们在田间忙碌着。

说起“任成秀”，他们大多知道这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为何取名于此，“任成秀”又是谁，村民们摇头疑惑。记者来到雍陌村村委会，负责修村史的郑承汉老人告诉记者，时间太久，很少人知道其中的故事。

任成秀河位于三乡雍陌村，起于桥头堡分水闸，止于茅湾涌泉眼段。长1.8公里，宽约12米。据老一辈知情人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受暴雨影响，中山市五桂山桂南村一带山头洪水来势凶猛，毗邻桂南村的雍陌村一带因为地势低洼常受水患威胁。“严重的时候经常整个村里都是水浸街，人根本没法出门，”郑承汉回忆说，“就在那段时间，突然从县里来了个领导，一路踩着单车来到雍陌村。大家都叫他任成秀”。与任成秀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还是18岁小伙的黄观宁告诉记者，因为任成秀皮肤黝黑，身形单薄，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卖鱼佬”。大队安排他住在一位老阿婆家，但是因为之间没有沟通，老阿婆以为他来偷家里的铜锁，硬是把任成秀的单车给扔到了门外。“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县委书记，谁会想到一个县委书记从石岐到三乡是骑单车来的呢？”

黄观宁说，这位带着北方口音的县委书记平时没什么架子。当他了解到群力大队(当时雍陌村一带的称呼)长期受山洪水患的困扰，严重影响生产，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便下决心帮助雍陌村彻底解决水患。善于调查的他带着一队人马在三乡的田间山头调研，他发现三乡地势特殊，被五桂山、凤凰山、丫髻山三面环抱，西南面临西江出海口，季候性影响严重，加上河涌不通，一旦暴雨来临，内涝就特别严重。他建议统一规划，开凿一条排灌河，并带领水利局的技术员谢蔚楨等进行选址，决定在雍陌村周边田间开挖排洪渠，引导洪水流入涌尾(即现在的泉眼村)河道。雷厉风行的他说干就干，统筹和协调河道建设，积极带领雍陌村及附近村民开挖渠道排洪。渠道开挖由各生产队派工，主要材料由县统筹，桥梁由公路部门建设，分水闸由雍陌大队建设。

“经过村领导和村民的共同努力，全长1.8公里的排洪渠在当年就竣工了。排洪渠在当年就发挥了效益，就在这年的9月5日，中山遭



遇特大强台风，正是由于修建了这条排洪渠，三乡顶住了压力，受灾程度相对降低，雍陌村民深感受益。”郑承汉说因为这条河是任成秀带头修建的，村民们都亲切地叫它任成秀河，时光慢慢流淌，任成秀河逐渐成为该河的正式名称，它也成为三乡镇主要排洪渠道之一。

近年来，为了维护任成秀河这个水利工程，三乡镇政府对该河进行分段整治，清淤、砌石、建桥、新建拦污水闸等，累计投资约900万元。如今，下游整治已基本完成，河两岸铺设了宽阔的人行道，栽种了花草树木。站在任成秀河岸，水清沙浅，鱼儿在水草间漫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条河流和任成秀服务人民的精神，就这样永远滋养护佑着这片土地。

（摘自2011年7月21日《中山日报》）

【点评】

没有轰轰烈烈的形式，任成秀的名字却成了不朽的丰碑，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树立了典范。他的成功说起来似乎简单，那就是他丢弃了一切形式主义的藩篱，走到群众中去，而且是到问题多、困难大、矛盾突出、意见强烈的地方去。然后把看到的、听到的问题及时解决，突破“虚”的层面，对症下药，像“解剖麻雀”一样，千方百计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对待问题，深入全面分析问题，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反映强烈的问题。他的成功，其实又不简单，因为在深入群众过程中，毅力、排阻力、洞察力、调研力、执行力以及对群众的亲和力“六力”他全都具备。

第三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融入群众是深入群众的最高层次。用心关爱群众，亲身加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些都能感动群众，但要达到被群众视为自己中的一员，却并非易事。毕竟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与群众在无形中有差异。

什么时候，当群众把你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了，才能说得上是融入群众。毛泽东说：“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

【案例】

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方群英

1945年，敌人对五桂山区革命根据地大扫荡以后，形势日趋紧张，上级党决定，把当时已暴露身份的方群英调到中山九区，负责15个有党组织的工作点。



方群英

方群英到了牛角。这里形势十分严峻，残暴的敌人围攻游击大队，抢割了所有禾田，掏干了全部鱼塘，乡亲们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成了大问题。

“方姐，这个时候你还敢来这里？”接头的党员吃惊地问道。

“是的，党派我来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方群英坚定地说。

白色恐怖下，群众虽然认识她却远远躲避她；一位平时熟悉她的妇女，低着头与她擦肩而过；一位老大爷把他天真的孙女拉回家来……

方群英没有灰心，她化装成一个沙田地区的农妇，先到党员苏英的家，和她家人一起光着脚干农活。几天以后，苏家各人担心方群英化装不像当地农妇的顾虑消除了。

为了恢复党组织活动，方群英四处奔波，把断了的线连接起来，寻找失散的党员干部。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她独行于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和迷迷糊糊的桑海蔗林之中。

一天，大雨使小溪变成宽阔的河面，方群英迈入河中，带纹的鞋底显得沉重，突然，一个趔趄，滚滚的河面淹没了她的身影，湍急的洪水无视这位熟谙水性的人，一直把她卷走100多米，幸好她抓住拐弯处的水芒树枝，才爬上岸来。

路在脚下延伸，她的足迹遍及牛角、波头、孖沙、濬深等十多个地方，方圆几百里，前后半年时间，在十多个工作点上，与每一个党员同志联系上，又通过党员同志团结了近百名基本群众，一场生产自救运动便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在坝头市场建立秘密联络站，方群英与另一位同志设法做一位老盲人的工作。她每次看望盲人都带点咸鱼、饼干和靛米去。下雨天，盲人不能外出卖唱，方群英就给老人讲《三国》、《水浒》。盲人病了，她一口一口给老人喂药，盲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你是好人啊。”盲人积极支持方群英的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建立了。

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方群英主动接近群众，问寒问暖，掏钱帮助一些困难户解决困难，群众喜欢找方群英，把她看做知心朋友，

愿意把困难疾苦告诉她。有的群众收工回来，还把饭端来，一边吃一边聊天，一位在茶楼当厨工的群众，经常拿点鸡肉、大鱼和猪肉来与方群英共享。

一天，群众打听到一帮坏人要袭击联络站，立即通知方群英和同志们转移，使敌人扑了空。方群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联络站接待了许多县地委的领导同志，由于有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从来没有出现差错。

（摘自郭伟强《方群英——一个村奴的道路》，载于《一代英姿》）

【点评】

方群英是珠江纵队的一个巾帼女杰。珠江纵队副司令员谢立全曾说她像一块磁铁，能够把男女老少群众吸引在磁场内。党员把她比作一棵良种，播种到哪里，都能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说她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就亮了一大片。而方群英给自己的定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人。在白色恐怖下，她热爱群众，深入群众，最后完全融入群众，从而深受群众的爱戴。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三讲

关心群众 关注民生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说起关心群众这个话题，不能不提到1934年毛泽东的经典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此讲话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文献，尽管过去了70年，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不少锐意走群众路线的领导干部精读此文，均能从中充分汲取营养，端正工作作风，形成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一篇文章对我的帮助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近年来我认真读了多遍，受教育和帮助很大。

2009年秋，我在济宁市委政研室工作时，曾参加过全国维稳工作联席会议到济宁调研群众工作时的一个座谈会。带队的调研组长是一位老同志，他在座谈总结时大段引用这篇文章，并详细介绍了文章的背景。会后，我马上找到原文，第一次认真学习这篇文章。

第二次是2011年5月，在省干部学院参加县长培训班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晓兵同志做了关于做好群众工作的动员报告，也



大篇幅讲到了这篇文章，并作为培训班重要学习资料印发给学员。我又逐字逐句读了一遍，还写了学习体会。参加那次培训时，正值我在梁山主持起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办法》等系列政策性文件，结合对这篇文章的学习思考，我的想法越来越明朗起来，对于政策如何把握心里有了底。回到梁山，我再次进村入户，面对面与群众交谈，了解群众对征地工作的看法、顾虑及要求。这次调查使我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群众并不反对城市化，农民大多都想成为市民，土地征收中各种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群众意愿集中在两点：眼前利益不吃亏，长远利益有保障。于是我想，我们没有理由延缓或人为阻滞城镇化，但要反对城镇化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随后我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座谈会，让大家首先弄清楚一个道理：我们搞城市化究竟为了谁、依靠谁？由此在思想上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问题。我还特别向参与起草的同志讲了毛主席这篇文章，目的是在政策立足点上取得共识。记得在当时，大家关注和争论的重点是具体的政策条文，我引出这个“大问题”后，大家的认识很快就取得一致，原则也就随之确定了下来：让群众“眼前能受益，长远有保障”。有了这个原则，具体政策就不难确定了，此前围绕政策的一些争议也迎刃而解了。

这次我进入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此文又列入必读书目，读来倍感亲切。此时，梁山按新政策进行征收土地工作即将展开。县里安排周末两天时间，对所有参与征地工作的同志进行政策及业务培训。我从党校赶回去参加了培训会并做了动员讲话，还特别领着大家学习了文章中的一段话：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

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题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会后几天时间，征地工作异常顺利，有的群众一大早就去排队，争取及早签约；有的村按群众要求，协议一直签到晚上11点多；还有一个村叫后孙庄村，本来没有纳入征收范围，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再三向县里反映，要求一并征收。

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发表距今已有68载，但岁月遮挡不了其字里行间闪烁着的唯物史观光辉。这篇文章带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唯物史观的立场，还是群众观点；无论是群众工作方法，还是始终根植于人民的情怀，这在今天是何等重要和珍贵，其指导意义又是何等现实而深远。学习掌握这些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相信每个同志都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有一点，它能够时时提醒和告诫我们：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心思才不会走神；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工作才不会走偏；做事始终不忘为了群众，政策才不会走调。只有在任何时候都紧紧依靠群众，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摘自2012年第7期《党员干部之友》）

这位领导干部的现身说法着实让人思考良多，感受良多，相信真心愿走群众路线的干部在读后也收获良多。文中有两处谈到思维方式时，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一是作决策时，要考虑“为了谁、依靠谁”，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俗话说的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如果明了合格的共产党员一定会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那么答案也就出来了。二是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要让群众“眼前能受益，长远有保障”。处处刁难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不让利或少



让利是行不通的。回头想想曾经的“让三千万工人下岗”理论，悖离群众路线到底有多么的远，它让下岗工人眼前失去工作，长远失去社会保障。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变国有为私有的既得利益者，显然是极少数人，这和造福人民大众的理念又是背道而驰的。只考虑群众眼前受益，忽视群众的长远保障也不行。比如，有一些村在征地时土地被征个精光，也为此得到了一大笔钱，但有些农民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于是又成为社会乱源。这就折射出公共管理部门思近而未谋远，尚缺长效机制的管控。

第一节 百闻更要一见

关心群众的实质就是不断维护群众的利益解决民生的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关心群众，关注民生，始终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战争年代，毛泽东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改革开放的当代，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关心群众，解决民生，第一步是要倾听民声。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不是缺少民声，而是缺少倾听民声的耳朵。只有知道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怎么想，才能找到工作的方向，才能办出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情。第二步就是要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在多听听群众

想法、看法基础上，进一步地看看群众的生产、生活，多了解群众的需要、需求，使我们作决策能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更加符合社会的实际。要通过各种渠道，调查研究，多与群众沟通，广泛地收集群众的声音，要懂得倾听，认真倾听、耐心倾听，走出去，请进来，促膝而谈。只有充分倾听民声，才能保障决策的科学性、群众性。三角镇是党代表常任制的示范点，又是“双下访”（党员干部下访企业、走访群众）的力推镇。三角镇村民原先没有自己的休闲场所，村民健身跑步需要走很远的路，为此便向党代表反映。党代表听民声、看民意，向三角镇党委政府反映了村民的需求和意见，从而得到了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规划修建了环境优美的三角山修身公园，方便了群众休闲健身。

【案例】

《民情日记》记明细

近日，民众镇党委开展镇村党员干部“下基层进万家促和谐”活动，镇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等365人将到全镇19个村（社区）中去，用《民情日记》记录下基层过程中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促进全镇党员干部改进作风、走出机关、深入基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下基层干部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

和以往驻村干部不一样的是，民众镇这次下基层活动范围的广度和人数都成为首例。据了解，参加下基层活动的党员干部涵盖镇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聘干及综合素质较高的党小组长等。365人的队伍将分散到全镇19个村（社区）的1795户联系家庭中去，平均每个村（社区）安排20名下基层干部，对联系户实行动态管理，每年重新排查一次，按实际需要



重新确定。

在下基层活动中，民众镇党委明确规定各党员干部要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下基层党员干部的交通工具问题、就餐问题一律要自行解决，不允许增加村（社区）的负担，不允许增加群众的麻烦。除此之外，严禁下基层干部借解决问题“吃、拿、卡、要”。在下基层工作中，民众党委要求每名下基层干部负责联系5户家庭，每年到每户家庭中家访的次数不少于6次。“保证每一位下基层干部实实在在地到联系家庭中去，把工作做到实处是我们这次下基层活动的主要目的”，民众镇组织办一名负责人讲到。

《民情日记》做台账，工作明细少不了

每一位下基层党员干部手中都有一本《民情日记》，在《民情日记》上，什么时间走访了哪一个联系家庭，群众提出了什么问题，党员干部做了什么帮群众解决问题的事情都将在这本黄色小本上记录得一清二楚。

民众组织办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到，《民情日记》是下基层活动最重要的体现，每位下基层党员干部都要及时记录好明细，建立下访台账，具体包括：家访的时间、地点和对象，活动内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已解决的问题，尚未解决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案等。在下基层时受理的各类问题，下基层干部要全程负责，跟踪督办，确保每件事都有解决过程，对需要转交其他部门办理的，应及时转办并负责监督落实。

为了保证下基层活动落到实处，民众党委成立了以党委各领导为组长、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每季度组织对下基层活动进行一次检查督办，通过入户抽查、电话抽查和其他检查方式对下基层活动进行监督。“做得好的会优先提拔任用，做得不好的要追究责任”，一名小组成员讲到，“这次下基层活动不是走过场，而是为群

众办实事，这是搭建党代表发挥作用的平台，也是畅通民众诉求渠道，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做法”。

（摘自2011年12月28日《中山日报》）

【点评】

民情日记无疑是帮助党员干部倾听民声的一个重要渠道。它不是工作日志的简单罗列，也不是事件的堆砌，从而弥补了工作日志的不足，它又不同于个人日记。民情日记来源于日常工作，又超越日常工作之上，它是在真实地反映民意民声的基础上，以下基层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感受和体验为主，结合实际去分析和研究下基层工作中的问题，是下基层工作中的现象和问题的升华，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民情日记的质量优劣取决于党员干部本身的态度和素质。一篇好的民情日记，对下基层干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都具有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可以更好地帮助党员干部知民情、体民意、解民忧。民情日记直接取材于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和丰富的群众生活，这一特性，使其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生活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党员干部只是视记民情日记为走过场，那也就形同普通的工作日志了。如果党员干部本身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能力差，民情日记的质量也就不会高到哪儿去。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即使民情日记记得再好，问题反映得再尖锐，如果不去设法解决，纯粹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话，那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不仅不能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反而疏远了群众，造成隔阂。

民情日记并非倾听民声的唯一渠道。2013年5月，中共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讲述了中



山倾听民声的众多渠道问题：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群众诉求表达‘八条渠道’，包括市党政领导分片联系镇区、企业、重点学校和党外干部制度，市长与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代表座谈制度，市长与政协领导协商座谈制度，市长接待日制度，市长专邮专线电话制度，市镇领导下访制度，领导干部挂点包村制度，党员干部联系农户（居民户）制度。同时，我们整合了市网络发言人平台、市网上政务投诉平台、行政服务在线等资源，建立了网络问政平台。这些都是基层企业和群众反映问题的好途径。”

“在此我还要提前透露一个消息，我们筹备多时的中山市政务微博拟于今年（2013年）7月份正式上线。届时将以市政府新闻办的名义开通中山市官方微博——‘@中山发布’，各镇区、市有关单位也都会在年底开通政务微博，加入‘中山市微博发布厅’。我们希望运用这种最具贴近性的新媒体发布权威信息、汇集民智，提高我们的舆论引导和社会管理能力，激发群众参与幸福和美中山建设的热情。希望到时候有更多的市民第一时间前来‘互粉’，一起‘拍砖’‘盖高楼’。”

第二节 铁肩担道义 为民鼓与呼

数十年的改革发展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改革发展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改革发展，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焦点，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失的所在。”如果改革发展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没有意义的。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民群众鼓与呼，才能把住改革发展的“脉搏”。

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关部门、许多党员干部都表示愿为群众利益鼓与呼，这是可喜的事情。也许因为职业的原因，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人大代表，发誓愿为群众利益鼓与呼的最多。提起人大代表，不由不让人想起全国知名的“忧民哥”——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全团审议发言，他深情地说：“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发言时数度哽咽，获得多次掌声。发言视频在网上飞传，感动全国网民。有网友取贺优琳名字的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2012年全国两会，贺优琳携12项改善民生建议，再掀“忧民哥”热潮。《羊城晚报》采访发文，标题轻快幽默：“忧



贺优琳



民哥”今年继续“忧民”。

“我非常高兴得了这个名号，这对我是肯定也是鼓励，让我知道当个好代表，敢于说真话，不能做哑巴。”今年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京的飞机上，记者又见到了贺优琳。

“去年我把财政收入要更多还利于民、调整财税分成比例、中央所有惠及民生的资金应充分考虑到广东等几个建议，递交给了全国人大，财政部也给了我答复，但是我对答复并不满意。所以，今年我还要再提。”在贺优琳看来，解决民生必须要有财政支持，但是目前的财税分成却十分不合理。

“举个例子，比如中山赚了100块钱，最后镇只能拿到12块、市能拿到18块，剩下的70块全部是省和中央拿走了，而中央就占了50多块。但最后要做最多事的还是地方一级：民生要解决都需要钱。”

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了10万亿关口，但是人民却感到什么都贵了，日子更难了。“以前中央拿大头，是为了集中资金办大事、办急事。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变了。10万亿去哪里了？怎么花掉的？是时候藏富于民，改善民生了。”

2012年，是贺优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五年。“五年里，我一直都知道这是沉甸甸的责任，我提的所有建议也都是民生建议。”最后一年，贺优琳准备了12条建议，也是提交建议最多的一年。

这12条建议包括“免费学前教育”、“允许异地高考”、“高校资源重新分配”以及食品安全、物价等问题，“今年我强烈呼吁尽快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把免费义务教育前移，从9年扩大到12年。”贺优琳说，自己在新浪微博上申请了实名微博，就是为了收集更多来自民间的建议和意见，“除了开会，尽可能多地接触热心关注两会

的老百姓，能够更多地把民生的呼声反映上去。”（载于2012年3月3日《羊城晚报》）

甚至连绰号孔和尚的北大著名教授孔庆东也在博客里对“忧民哥”大加褒扬。

【案例】

公仆应是忧民哥

主持人：被称为“忧民哥”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3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显露他忧国忧民的一面。此次贺优琳带了12份建议而来，反应的基本都是民生问题。孔老师，咱怎么看这个“忧民哥”？

孔庆东：我们一开两会啊，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媒体呢，也经常把聚焦点放在那些善于表演、善于作秀的，甚至放在一些明星的头上，那么这样就加剧了我们对两会“作秀”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想，每年两会还有几千名代表呢，几千名代表里，都是没用的？都是坏人？不是。我记得我前两天在微博上有过大体的一个感觉，我没有统计，我感觉我们两会代表有一半，50%，都是没有议政能力的好人。是好人，但没有议政能力，跟那儿坐着呆着；然后剩下这一半里边呢，有20%的没有议政能力的坏人。他也没有议政能力，但是心眼不好，但是呢，由于没有议政能力，也危害不大；另外呢，有20%的有议政能力的坏人。他有议政能力，但是他提出的提案都是坑我们国家、害我们国家的，所以老百姓很愤怒；看到这些，那么最后剩下的10%呢，是具有议政能力的好人。这才是我们人民群众希望出现的真正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么这里边就包括这位“忧民哥”。你看，他并不是很大的官，是一个学校的校长，那么他呢，真正地忧国忧民。他肯定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由于得到网



民的拥戴，他就一届比一届认真，更认真。那么这样的人，他就是有议政能力，同时又是有良心，所以他是好人。这样的人大代表，太少了！第一个，我们希望涌现出越来越多这样的两会代表；第二个，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媒体，正经的媒体好好去报道他的那些建议。当然，表扬他本人也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他呼吁他那些建议。刚才说他带了12份建议，都是有关于民生的，其中提到几个，我一看，跟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嘛。第一个，他呼吁放宽生育政策，结束一胎制。我们曾经多次很尖锐地批评过现行的一胎制，甚至用了这样的词，说“罪恶的一胎制”，就是说你这一胎制再不结束不行了。你看我们人大代表里还是有明白人，知道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还有他提出什么“异地高考”啊、什么物价啊等等问题，我相信这些不是他坐在家里想出来的，而是他真正地去了解了社会百态，了解了老百姓的呼声。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不要说有10%这样的人，咱们再增加，增加到1/3就行了。我们有1/3的人大代表是有议政能力的好人，人民群众对两会的观感一定会改变，大家一定会为两会鼓掌、欢呼、称快。通过这些人大代表的建议，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民生，改变这个社会的和谐度。

【点评】

孔庆东说得好，公仆都应该是“忧民哥”。而当“忧民哥”成为一人之赞誉的时候，恰恰反映出许多公仆没有尽“忧民哥”的职责。当“忧民哥”走红媒体的时候，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群众殷切的期盼，数不尽的民生问题正等待着更多的“忧民哥”鼓与呼。

第三节 四两拨千斤 一木支危楼

一提起关心群众，关注民生，许多党员干部的视野都停留在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这样的“大事”上，而对群众生活中的诸多“小事”不屑一顾。古语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真诚地为人民群众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化解每一个具体的矛盾，把“小事”办好、办实，自然也就成了大事。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只是一件小事，就恰恰成为改善或恶化干群关系的导火索。

【案例】

姜田鱼水情

1942年春，中山抗日游击队陆续进入五桂山区的石门、合水口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队纪律严明，很快在群众中打成一片。由于生活十分困难，战士们常常挖野菜充饥，也偶而到河里捉点鱼改善一下伙食。一天，几个战士从山溪里捉了一些鱼。几位乡民看见了，就说：“煮鱼没有生姜去腥，很难吃，这旁边就是姜田，你们拿些回去吃吧。”说着，一个村民挖了一块姜就递过去。谁知这块姜田，并不是那几位乡民的，姜地主人知道了，便骂起街来，说游击队战士偷了他的姜。这事传到了游击队部，拿姜的战士也主动向领导做了检讨。为了教育部队，队领导便把拿姜的战士禁闭起来，并立即派人向姜主人道歉和赔偿。村民知道此事后，都埋怨那个姜田主人，还推举了几位代表到部队来，证明那块姜不是战士随意拿的，而是经群众一再劝说下才收下的，还恳求部队免除对战士的处



分。这件事虽是小事，但影响颇大，很快传遍了五桂山区，历来饱受日、伪、顽军、土匪欺凌的山区群众对抗日游击队更亲近了。很快，游击队不仅站稳了脚跟，还逐步向外发展，根据地因而得到巩固。

（摘自欧初《少年心事要天知》）

【点评】

细节决定成败，小事影响大局，小小的一片生姜，就让中山抗日游击队在老百姓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大大地稳固了根据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员干部都必须关注和解决群众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的困难。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实干”就是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困难。

近几年，各镇区通过十二五规划，纷纷搞“十大民生工程”，总的来看，基本上都属于解决群众集体受益的较宏观的问题，诸如道路设施建设、医院建设、垃圾处理等等。但也有一些镇区将群众个人受益的工程提上日程。

民众镇将妇科病普查普治纳入十大民生工程，通过关爱妇女，让家家户户直接受益。

2011年11月民众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由19条村及社会的知名人士、各大商会、同乡会代表分成七个组就2012年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提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通过计生办提议将“全镇妇女的妇科普查普治工作”列入“2012年十大民生工程”。此项工程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妇科病普查对妇科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达到有利于提升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率及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项目通过后，该镇计生办高度重视，及时制定了项目落实进度表，把工作作了详细分

工。该计生办工作人员介绍，项目预计共投入经费100万元，分两年完成，第一年完成60%，投入经费60万元，第二年完成40%，投入经费40万元。2012年8月起开展普治工作，对经过治疗后及时落实长效避孕措施对象拟按“节育奖一次性奖励”标准兑现四术补助（上环补助300元，结扎补助1000元），通过普查普治的开展及奖励的兑现达到促长效避孕措施的落实，进而加大镇内四术库存的清理力度，使该镇人口计生工作更上新台阶。

五桂山则打出了关爱儿童牌，大张旗鼓地建设“蛋奶”工程，提出“鸡蛋+牛奶，强壮五桂山新一代”的口号。

从2012年新学期开始，五桂山学校1077名学生每人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盒学生奶。这是五桂山党工委、办事处大力推动的一项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民生工程，是一件让改革开放丰硕成果惠及五桂山群众的实事、好事。五桂山办事处划出100万元专项资金，在五桂山学校实施“蛋奶工程”，按照每名学生每天3元的标准，指定由白石鸡场出产的鸡蛋和晨光乳业公司出产的学生奶作为“蛋奶”工程的产品，让学生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盒学生奶，并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数据库，真正实现科学供蛋奶。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四讲

宣传群众 凝聚力量

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党都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作用，如先后创办《红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机关报，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形势。这在中山党史上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将近沦陷之时，欧初曾被派往五桂山外围的南朗做群众工作。为使群众认清形势，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报刊作为宣传的重要阵地。如中山四区区委书记谭桂明找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曾谷和时任区委青年委员的欧初商量，决定出版《民气》报，由曾、欧二人负责。为了油印该报，曾谷和欧初住到灯笼坑贺兆军家。油印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据欧初回忆，他们总是一人刻蜡版一人持枪放哨，二人分工合作。

油印报纸也需持枪放哨，可见当时宣传群众的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然而，形势越严峻，越要迎难而上。《民气》报总共出了约10期，对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珠江纵队成立后，珠纵第一支队出版党委机关报《抗战报》，不断宣传群众、鼓舞士气和瓦解敌人。

美国政治学者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曾

总结出了宣传的四个目标：煽动与对手的对立情绪；保持与自己人、朋友的友好关系；争取中立方的合作；瓦解对手的斗志。此论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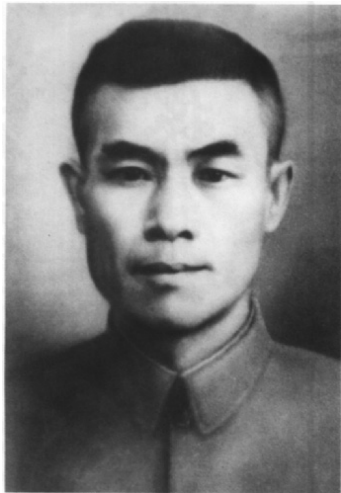
【案例】

统战宣传高手袁世根

1939年，袁世根经友人介绍到了罗定县任民教馆长，并主办《新罗日报》（油印小报）宣传抗日救国，深得当地地下党组织的赞赏。地下党员苏德深和他交朋友，得知他在任教和主持海洲小学期间思想进步，表现良好。而此时在中山三区小榄的国民党“挺三”司令袁带（实权掌握在副司令屈仁则手中）看中他文墨好，虽不同乡，但同宗（据李逵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载：“袁带原为海洲乡人，后迁居小榄永宁。”）希望他回去协助做文字工作。而此时海洲内部宗派争权等问题也不少，又希望他能回乡主持乡政工作。袁世根把袁带几次写信请他回乡做事的事跟苏德深讲了，与苏商量该怎么办。苏向中共西江特委候补委员李超汇报了此事。李对此很重视，希望乘此机会在沦陷区建立我党的地下据点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并掌握“挺三”动向，遂向中共西江特委汇报此事，经研究后决定让袁世根回海洲当抗战乡长（当时有两个乡长，一人是汪伪乡长，一个是抗战乡长），并详细布置他回海洲后要利用袁带当他是子侄的有利条件，同袁带及其家属搞好关系，同时通过袁带与屈仁则搞好关系，争取各方面的人。袁世根服从了中共西江特委的决定，放弃罗定民教馆长职位返回海洲。当时袁世根未入党，中共西江特委就让苏德深继续和他联系，准备在他回海洲后再通知中山地下党组织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1940年袁世根回到海洲后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

当时海洲内外都处于封建反动势力和日伪、国民党的统治与包围之中，东边的小榄是中山三区反动统治势力的中心，有大天二袁带、屈仁则、谢老虎、巢添林、莫予京等；北边的顺德均安有欧阳培的封建土匪武装；西边的新会荷塘有李桂源的封建土匪武装、李盈和陈三的“西江别动队”、“挺三”的土匪武装及日本特务分子容仲博的土匪特务武装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袁宗思、袁锦辉、魏觊铭、魏贤祥等封建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袁带、屈仁则有密切联系）掌握海洲的实力，并由其代表人物袁艺文、魏煌当自卫队正副队长，掌握着武装，以维护其本身利益。他们还有两个代表人物当副乡长，其中袁见成是袁宗思、袁锦辉及长房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而袁带的势力还直接伸到海洲，除派莫予京盘踞海洲外，还有其他亲信，如在袁世根家庭所在地民乐坊直接威胁着他的一股封建势力，就是袁带的亲信袁文辉。这些人出小报攻击袁世根左倾，企图把乡政权夺到手。袁世根按中共西江特委和李超的布置，与袁带及其家属关系搞得非常好。袁带大小几个老婆勾心斗角，家庭纠纷很多，袁世根当他们的调解人，不但袁带信任他，其家中大小都信任他。屈仁则有文化，袁世根也是读书人，两人谈得来，“交情”很好。“挺三”有几个支队都是挂名的。只有嫡亲支队梁自带最强大。通过袁带与屈仁则，袁世根又与梁自带成为“好朋友”。后来，李超曾来海洲和袁世根一起到过梁自带的棚寮（驻地），对袁世根从罗定返海洲后的工作很满意。由于袁世根统战工作做得好，与袁带、屈仁则、梁自带及海洲



袁世根

的上层人物搞好了关系，利用了封建势力的内部矛盾，不但使袁文辉这股反动势力的阴谋没有得逞，还使海洲这个点站稳了脚跟，加上海洲自卫队长袁艺文也很听袁世根的话，并且安排了容辛（地下党员）当副队长，这样，海洲自卫队就掌握在我党手中，海洲也完全为我党所控制了。党组织指示古镇的地下党员苏松柏（原古镇粮所主任、离休干部），凡有我党刊物、宣传资料都送一份给袁世根，继续培养他。此后，苏松柏即委任海洲一个到古镇卖熟烟的小贩袁奕添定期把资料送到袁世根手里。

（摘自《中山文史》第40辑）

【点评】

袁世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由于工作需要，党派他在敌视我党的势力中开展宣传工作。国民党“挺三”成分复杂，部分官兵基于爱国意识，有抗日要求。但“挺三”的掌控者却很反共。袁世根巧于周旋，不仅在夹缝中求生存，还大大地

发展了我党领导的力量，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政治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宣传的四个目标，袁世根均能很好地完成，可以说是中山党史上宣传工作的范例。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或走上街头，走进田间，向形形色色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他们用行动和鲜血，用大无畏的精神，向群众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证明了共产党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



《抗战报》

的政党。通过群众的口耳相传，共产党逐渐建立起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获得了群众难能可贵的信任和衷心拥护。

今天，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无疑掌握了更多更好的宣传资源。与此同时，世情、国情和党情也都日趋复杂，宣传群众仍然是宣传工作的关键所在。党员干部只有勇于担当起宣传群众的责任，明确当今宣传群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立足实践，重视群众的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真正做好宣传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邓小平曾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把保持党组织、党员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主动向群众宣传国家和党的各项工作面临的形势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一节 滴水加入江海 方能成为波涛

党员干部宣传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要宣传群众，提高宣传的效率，就要不断地了解群众，更多地聆听群众的声音，同时不断地为百姓代言，贴近百姓心灵。邓小平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如果说党员干部是水滴的话，那么群众就是大江大海，水滴只有加入江海，方能成为波涛。

【案例】

网民有事爱找“@莲峰警长”

随着“@莲峰警长”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网民也更愿意通过微博向“@莲峰警长”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在太平路和延龄路交界处的一排老房子中间，莲峰派出所小小的院子里停满了车辆，显得有些拥挤。办事大厅内一本从2006年开始登记的群众意见登记表只写了十几页的群众反馈意见。和这本反馈意见本上的冷清相比，莲峰派出所认证的新浪微博账号“@莲峰警长”却拥有1万多粉丝，每天都有网民发微博给“@莲峰警长”。“至少十条，多的时候有五六十条，”莲峰派出所所长蒙爱民说。如今，不仅仅是辖区内的事情，不少镇区，如南头、东升的网民遇到问题也会发微博给“@莲峰警长”。

2011年，被同事称为“电脑小王子”的蒙爱民为派出所注册了新浪微博账号，使其成为中山首个公安派出所开设的微博，此时“@平安中山”已开始运营，并在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中起到了信息发布的重要作用。2011年1月5日，民警给经常烧水忘记关煤气的社区老人送了一个带响声的电水壶，消息通过微博发布后，引起了



蒙爱民在管理微博

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赞许。这让蒙爱民意识到通过微博和网民交流的价值所在。

在运营微博的过程中，蒙爱民对基层派出所工作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2011年，响应公安部清网行动，他们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蒙爱民喜滋滋地将工作成绩发上微博，未曾想到竟然没有一人转发，而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引起众人关注。这让蒙爱民意识到，群众关心的是身边的小事。渐渐地，“@莲峰警长”开始转变思路、改变角度。

莲峰派出所在做好网下工作的同时，网上的“平安中山”宣讲工作也一直持续。“@莲峰警长”针对辖区内和周边地区入室盗窃、电信诈骗等案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不时在微博上发布预警信息。

随着“@莲峰警长”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网民也更愿意通过微博向“@莲峰警长”提供线索，寻求帮助。一位市民的车在湖东街被另一辆车堵住无法出行，在网上发微博给“@莲峰警长”，蒙爱民立即让民警去处理，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辖区雨污分流工程结束后，施工方没有将沙井盖封严实，一有车辆经过就咣当直响，受影响的居民向“@莲峰警长”投诉，派出所立即便和居委会协商解决；老城区雨污分流路边停车阻碍了道路通行，网友向“@莲峰警长”抱怨，警长也温言相劝……

当“@莲峰警长”不再高高在上，逐渐成为群众心目中的“隔壁大哥”，群众愿意和他沟通时，“全民治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莲峰警长”的铁杆粉丝们，或生活在莲峰社区，或在这里经商，他们经常在微博上报告治安问题，如有人聚众赌博等。蒙爱民说，下一步希望能够增加辖区内的粉丝数量，让居民有问题能够随时通过微博向“@莲峰警长”反映，加强警民互动。

2012年，莲峰派出所辖区内有效警情下降16.4%，2013年1—9月

份，下降36%，其中机动车失窃案下降69%。

2012年，中山开始推行“全民治安”行动以来，“平安中山”更具魅力。今年上半年，110 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3.8%。

（摘自 2013 年 10 月 16 日《中山日报》）

【点评】

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的眼界更为开阔，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多样，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日趋多元化，这使得宣传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群众虽然作为宣传工作的对象，但并非被动地接受党的宣传，他们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诉求。这就要求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必须与群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既要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工作，又要尊重群众表达的愿望，聆听群众的声音，了解群众的需求，采纳群众合理的意见。

聆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聆听群众的声音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群众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渠道也相应增加。微博、微信等新兴的沟通方式，面谈、电话、意见箱等传统的沟通方式，都成为群众可以选择的沟通工具。但是，不论沟通方式如何增多，都比不上党员干部一颗真诚聆听的心，而中山莲峰派出所的民警们，就有这么一颗赤诚之心。

“@莲峰警长”是莲峰派出所开通的官方微博，现已拥有一万多名粉丝。凭着热心、及时、便民的消息发布和微博回复，“@莲峰警长”成为了群众心目中的“隔壁大哥”，粉丝数也从初开通时只有100多人，到现在已增长了将近百倍。“@莲峰警长”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以扎实、勤恳、谦卑的姿态，认真聆听群众的声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从而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

在2011年，微博还属于迅速崛起的新生事物。莲峰派出所开通

微博，把微博作为有效的宣传平台，成为中山首个开设微博的公安派出所，显示出其敏锐的时代触觉。微博加强了该所民警与民众的交流，使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实在、平凡、为民众处理琐事的警察形象。透过微博，民警不仅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宣传防骗等实用技巧，而且了解到群众的想法、困难，还能接受群众提供的线索，在现实中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在这里，微博架起沟通的桥梁，民警竖起聆听的耳朵；在这里，民警不止于聆听，还付诸行动；在这里，民警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达到宣传群众的良好效果。

与群众交流是一门学问。聆听群众的声音不仅仅要用心听，还要用心学，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意见中，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对于群众合理的意见，党员干部要虚心接受。对于群众基本合理的意见，党员干部要做合理的部分，办不到的要向群众解释；不合理的部分，党员干部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避免造成双方的隔阂。党员干部应当把从群众中学得的经验，通过宣传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通过聆听——采纳——宣传——聆听这一良性循环，宣传群众工作一定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节 若要人下水 自己先脱衣

行动是最好的宣传。宣传群众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应当落实到行动中。党员干部只有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党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时刻保持自身的

先进性，以身作则，做好党的形象代言人。

我们不妨回溯历史，看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山党员是如何以身作则的。1940年，梁伯雄部队内建立中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番号为“挺三”第一支队新建小队。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是这支党员占多数的小队，坚持“不妄取群众一针一线”，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九区群众的支持。欧初当时担任该队的党代表，据他回忆：

学习训练之余，我们安排大家去做群众工作。大家分头到农民群众家里，一边谈天一边宣传抗日道理，注意同贫苦农民交朋友。我还带大家主动帮驻地附近的农民割禾。很快，附近就传开了：有一支“蛮声仔”队伍，最守规矩，不抢不赌，亦不吹鸦片，还帮农民做事。见识广的人觉察到我们同原先的“抗先”相像，于是就称我们为“抗先队”。

新建小队的队员们通过与农民群众面对面的交谈，和他们成为朋友，宣传抗日。队员们更是以身作则，严守纪律，主动帮助农民干农活。群众对他们的言行印象深刻，自发地传开了他们的事迹。队员们寓宣传于谈天，寓宣传于行动的群众工作，显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放眼当下，也不乏以身作则的党员。2012年4月，中山市直属机关党员志愿者服务总队成立，队员人数达数千名。他们积极走街入巷开展志愿活动，如走访困难职工家庭、到建筑工地慰问烈日下辛勤劳作的建筑工人、向市民宣传安全和卫生知识、参加植树活动等。党员们用自己点滴的行动，汇聚成为美化城市的力量。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其实，

如果每个党员都付出行动，以身作则，我们的世界又何尝不会变得更加美好呢？

【案例】

牛角往事

容海云刚住下来，就换上当地劳动妇女的打扮，帮农民下田劳动。农民下田，她就跟着下田；农民采桑，她就帮忙采桑。有一次，我见她打着赤脚，拿着东西走过一条独木桥，就走过去想帮她。她连说不要紧，还告诉我她在顺德经常挑东西，已经习惯了。一闲下来，她就逐家逐户去访问贫苦农民。很快，她同梁财宽、周二女等青年妇女成为好朋友。当时九区一带的教育比较落后，妇女更没有读书的机会。容海云就对大家说：“你们应该读书，我来教你们。学识字，将来做事谋生才容易。”大家都非常赞成，但是又觉得一无场地，二无书本，困难很多。容海云就出主意，发动大家共同出力，有人拿来一捆竹，有人拿来一担稻草，还有人送蔗荚、送竹篾，出力的人就更多了。两三天功夫，一间茅寮就搭好了，比起周围农民住的茅寮毫不逊色。村里的农民都称这间茅寮为书馆，识字班就在这里成立了。一开学，就有将近20个农家女来参加。用的书本全部是容海云自己编的，每一课都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除了教识字，她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讲革



1949年冬欧初与夫人容海云摄于广州

命道理。这批妇女很快就成为群众工作的骨干，其中几位后来还参加了部队，成为出色的交通员。

以识字班作为依托，容海云很快在牛角、吉昌围、乌沙等几个村子组织起姊妹会、兄弟会等群众团体，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进而建立了党组织。这期间，地方党也派了一些秘密党员在九区做群众工作，谭本基在石军沙，郑丽群在孖沙，都相继打开了局面。这些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从各方面大力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游击斗争。我们也积极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配合群众开展反“霸耕”等活动。

所谓“霸耕”，指的是恶霸将收成好的田地鱼塘从佃农手中强占过来经营。九区跳出来霸耕的家伙，大多以“民利公司”做后台。当地的恶霸梁九，倚仗其兄在“民利公司”当大队长，到处霸占良田。受欺压的佃农敢怒而不敢言。1941年春，他见农民冼逢胜、周自胜佃耕的12亩桑基鱼塘收成好，就写了一张条子，声称这12亩桑基他已经买下，不准冼、周二入再耕。这12亩桑基是冼、周两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如被霸占走，两家人就走投无路。当地党组织知道这事，马上来同我们商量，共同决定先礼后兵，由兄弟会写信给梁九，劝他不要霸耕。梁九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带了十几个人，扛着一挺机枪，来到牛角，站在桑基上气势汹汹地叫嚷：“谁人敢阻我的生意，我就用机枪扫死他！”一些群众慑于梁九的淫威，害怕起来。我们就出面通过兄弟会、姊妹会再做工作，并表示部队愿做农民兄弟的后盾，发动大家帮冼、周两家强行开耕，同梁九针锋相对。他派人来斩桑枝，群众就将桑叶运走；他派人将鱼塘的水库干，群众就去捉鱼。梁九这下碰上了硬钉子，只好央求给他耕一半。积极性高涨的群众寸土不让，梁九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次斗争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部队的影响也迅速扩大了。接着，部队

和地方党组织乘胜前进，领导群众粉碎了“大天二”梁养、梁润带强行霸占牛角200多亩耕地的阴谋。

牛角农民的胜利，传遍了九区。各村农民的斗争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了。于是我们又发动了大范围的反“伪票”斗争。

所谓“伪票”，就是伪军征收的“禾标”，亦即军粮。本来“民利公司”已经在本地征收了禾标，但是驻在三角一带的“民利公司”大队长“大骨锡”又公开投靠了日寇。他同驻在三区林头的伪军团长黄礼勾结起来，又要在九区为伪军征收禾标。这对当地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纷纷来找我们部队求救。我们同群众商定，采取两手办法：一方面各乡兄弟会共同行动，天天去“民利公司”请愿，说我们已为“公司”负担禾标，没有理由再向投降了日寇的黄礼、大骨锡交禾标；另一方面我们部队也旗帜鲜明地为群众撑腰，日日夜夜在驻地一带布防、巡逻，宣告如果有人胆敢前来收“伪票”，必严惩不贷！这一来军民互相呼应，声势浩大，伪军固然不敢来犯，“民利公司”方面也不得不顺水推舟，声明拒绝黄礼等的征敛。反伪票的斗争胜利了！群众一算，每亩田可以少负担20多斤谷，负担明显减轻。农民们从中看清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因此更拥护我们部队。

（摘自欧初《少年心事要天知》）

【点评】

容海云不负所托，顺利开展了群众工作。她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她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穿什么，她就穿什么；群众怎么劳作，她就怎么劳作。她挨家挨户走访贫苦农民，与农民面对面地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容海云了解到当地教育比较落后，妇女们没有识字的机会，于是号召村民组织识字班。由于这一号召符合群众们的

愿望，识字班迅速组织起来。容海云依靠识字班宣传抗日救亡，在妇女中发展出一批群众工作的骨干。从容海云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成功在于熟悉群众的生活，了解群众的需要，并为解决群众的困难付诸切实的行动。容海云实实在在的行动，使群众认识到她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凭借这一举措，容海云迅速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组织起姊妹会、兄弟会等群众团体，有效地推进了群众工作。

此外，我党驻九区部队积极配合群众开展反“霸耕”、反“伪票”活动，也极好地展现了我党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面貌。九区群众深受恶霸“霸耕”和伪军“伪票”之苦，但却敢怒不敢言。党组织了解到这一情况，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发动群众起来反抗。最终反“霸耕”斗争取得胜利，群众激动地对此进行宣传。很快，“牛角农民的胜利，传遍了九区”。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反“伪票”斗争同样在军民的互相呼应下，取得了胜利。

不论是容海云，还是九区部队，他们在了解到群众的心声后，用实际行动满足群众的需求，解决群众的困难。以身作则的态度，扎扎实实的行动，实实在在的成果，是最好的宣传。群众听其言、观其行，“从中看清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鉴往知来，过去发生在牛角的往事，对当代中国无疑仍有着借鉴作用。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都是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的行为准则。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保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作表率，本身就是很好的宣传群众的方法。

第三节 好舵手能使八面风

宣传群众要讲究策略，不同的策略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俗语云：好舵手能使八面风。针对性强、创造力十足的宣传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使宣传富有针对性，必须了解群众的喜好。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并结合宣传工作的具体需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宣传群众也要讲究创造性。富有创新精神的宣传，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党领导下的中山县新学生社就为宣传反帝，组织过一场创意十足的大巡行。据当事人回忆：

青年学生经常组织大巡行，有时更在夜间举行所谓“提灯大巡行”，唤起民众，宣传反帝，那时的巡行，常有化装队伍，有的扮成乌龟模样，头戴平顶草帽（那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日本货），称为“乌龟戴草帽”；有的扮成母猪，手拿阳伞（用日本布制成，也是来自日本），称为“猪母担阳遮”。这样化装，非常引人注目，宣传效果很好。当时看过巡行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在大巡行中，化装队伍所使用的是非常形象的宣传方式，以致时隔多年，仍让观者记忆犹新。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党员，应当学习这种形象化的宣传，争取用更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除了利用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制作黑板报、宣传栏等传统的宣传方式外，党员还应灵活运用在线访谈、网络专题、视频

专题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与群众的互动。应当注意的是，不论运用哪种手段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都必须贴近群众的生活，运用群众的语言，这是获得群众喜爱的重要保证。

【案例】

在伟人故里的日日夜夜

打回广东后，文工团首要的任务就是积极向新区人民宣传我党、我军和政府的城乡政策，和为人民服务、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宗旨。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为了使群众听懂和接受我们的宣传，回到广东，在北江、东江地区，我们用客家话演出，到了珠江三角洲就改用粤语演出。我们一进石岐，就在街头演出了《约法八章》、《买卖公平》等粤语小调剧。《买卖公平》宣传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宣传了我军的城市政策。李昭同志扮演一个小店老板娘，她一出场就用白话数白榄：“我叫李师奶，家住石岐厚兴街……”群众一听，感到十分亲切，引起了一片欢笑声。这些演出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戳穿敌人对我军的污蔑和造谣十分有效。

我们在石岐影响最大的演出是用广州方言演出歌剧《白毛女》。公演了20场，场场爆满。有的市民买不到票，就围着戏院门口的大喇叭下听戏。喜儿的苦难引起无数观众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地主黄世仁的凶残激起群众无比的愤怒。这部歌剧对部队战士和石岐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部队增强了斗志，使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为配合部队坚守海防前线，保卫南大门的任务，我们创作了大型歌舞剧《人民战士》，反映了解放军坚守南大门，英勇打击敌人的英雄事迹以及部队与南海渔民的血肉联系。剧情感人，歌曲优美雄

壮，舞台技术也比较新颖。舞台美术组通过幻灯的形式，在布幕上表现出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渔帆点点，以及来犯之敌舰被我军炮兵击中下沉的景象。歌剧在石岐、大环、唐家等地演出均引起轰动，并获得1952年全省文艺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角洲沿海走私现象猖獗。为配合我军打击走私，我们创作了粤曲小调剧《缉私立功》，以表现我军战士立场坚定、抗拒腐蚀、正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揭露走私者的丑恶面目。由于该剧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粤曲小调，易懂易学，演出后，战士、群众也朗朗上口地唱了起来。我们在中山各地巡回演出了近百场，各团宣传队又到部队驻军的村庄演出，几乎演遍珠江三角洲。在湾仔演出时，澳门也来了不少观众，影响较大。1951年初广东军区选拔此剧参加中南军区首届文艺汇演，《缉私立功》荣获一等奖。

1950年10月，为配合抗美援朝宣传，舞蹈组及时创作演出了舞剧《冲过去消灭它》，用舞蹈语言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形象及美国侵略者的疯狂丑恶面貌。对发动部队、群众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掀起参军热潮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年秋，为配合部队的战备大练兵及剿匪肃特作战任务，我们排演了四幕话剧《战斗里成长》。该剧讲述一个解放军营长在旧社会被地主逼得妻离子散，参加八路军后，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中与妻子重逢，才知道身边的通讯员竟是自己的儿子，这孩子作战英勇，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悲欢离合，剧情感人，战斗场面激烈、逼真，对部队鼓舞很大。我们在石岐中山广场、大环、前山、湾仔、乾务、深圳、南海等地巡回演出了十多场，受到各界的好评。

文工团改变为军分区宣传队后，创作了歌颂东江纵队女卫生员陈笑影英勇杀敌、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多幕话剧《大岭山的故事》。为配合地方的土改运动及部队忆苦诉苦阶级教育，创

作了四幕广州方言歌剧《张明诉苦》。内容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诉苦，反映贫苦人民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逼得家破人亡，受压迫剥削的悲惨故事，体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共产党，保卫胜利果实的精神。我们在中山各地巡回演出，每演出一场，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对推动部队的诉苦运动和配合地方土改运动的开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到三灶岛演出时，正好遇到台风袭击，观众冒着暴风骤雨看完演出。我们被群众的精神所深深感动。有个战士看着看着突然嚎啕大哭。一位女同志问他为何这样伤心，他说：“我的命和阿明一样苦呀！”

（摘自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新声》）

【点评】

好一句“我的命和阿明一样苦呀！”战士的一句话，表明了文工团的演出是密切联系实际，战士也好，民众也罢，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宣传工作中，只有获得群众的共鸣，才算取得成功。文工团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中山解放后，两广纵队文工团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中山做了许多工作，为政治教育宣传起到很大的作用。文工团的成员密切配合党的政策，结合地方实际进行创作，获得了群众的喜爱，很好地完成了宣传群众的工作。宣传群众必须牢牢抓住群众的注意力，把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整合到宣传中，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文工团践行实事求是和群众观点，重视运用当地的群众语言，用粤语创作演出了《约法八章》、《白毛女》、《人民战士》等剧目，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工团在宣传工作中取得的成功，有两点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宣传群众注重针对性；二是宣传群众强调创造性。宣传的针对性，

即立足实践调查，根据宣传的目的、内容、对象，对宣传的形式进行相应的设计，使群众在观赏演出的同时，有效接收到宣传组织者希望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既让群众欣赏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又使宣传工作者达到宣传的目的，正可谓一举两得。宣传的创造性，即深入实际生活，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探讨实际的方式方法，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新颖的表现形式、新鲜的话题内容，更能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因此，宣传群众应当注重创造性，以充满创新精神的宣传方式，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五讲

组织引导 发动群众

各级干部一定要牢记，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

——江泽民《以人民群众为本》（1994年1月1日）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人民群众需要组织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组织群众的问题。在《论持久战》中，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组织起来》中，他提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中，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群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刻认识到党员重视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意义。



党员要重视组织群众，因为群众力量一旦组织得法，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党员要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因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据《党的知识小百科》的定义，组织群众的内涵有三。第一，党的群众工作的中心内容。即通过教育、发动，把群众动员起来；并编制成一定的组织，使群众争取自身解放，谋求幸福的自发倾向，在党的领导下，变为有组织、有目标的自觉活动。第二，党的群众工作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党组织为使群众参加某项工作并完成预定的任务，在通过教育、动员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实施具体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把群众编制成一定组织；交给一定的工作任务；确定完成任务所达到的目标，完成任务的措施、途径；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总结完成任务的结果。第三，党的群众工作中的组织保证。在各地方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党组，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做好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各级党委讨论和解决群众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指出正确方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干部路线，指导群众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纪律建设等工作，发挥群众组织联系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党员干部要想有效地组织群众，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必须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作用。

第一节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

习近平指出：“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

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就组织群众而言，要想永不脱离群众，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古语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要轻视群众，要尊重群众、心系群众，这也是正确的群众观的必然要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党员干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创造和选择，尊重群众的劳动成果，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要有爱民之心，要懂以人为本，要主动、认真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要与脱离群众的倾向划清界限。这是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有效组织群众的重要保证。

常言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员干部只有把尊重群众、心系群众落实到组织群众的行动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尊重群众、心系群众，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待，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切实做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系心上；就是要改进工作作风，避免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在组织工作中，这两种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



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由此可见，组织群众必须立足实践，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组织方法，切忌脱离群众，想当然地进行组织。正确的群众观要求党员干部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征求群众的意见，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组织群众工作得到群众的支持。

【案例】

东区有支“夕阳红”交通引导队

在东区街道行走，每当上下班高峰到来的时候，在街头的某个转角，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吹着哨子挥舞着小旗引导行人与非机动车的老者，他们就是东区公共文明引导员，活跃在东区主要街道的11个十字路口。

“夕阳红”组建已久 由城管劝导员到交通引导员

11月6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山路顺景花园路口，63岁的吴义美阿姨很忙，不时吹响哨子，手里握着的红旗来回挥舞。“请走这边。”开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的年轻人，听到吴阿姨的提醒放慢速度，乖乖骑上非机动车道。

由今年（2013年）2月起，每天上午上班时段和傍晚下班时段，

吴阿姨和她的老伙伴们都风雨不改地出现在东区的多个十字路口进行交通引导。与别的志愿者队伍不同，这是一支“夕阳红”队伍。队员年龄由45岁到70岁不等。吴阿姨是这支队伍的领队，其他队员都定岗引导，她的主要任务是巡逻，外加队员请假时替岗。

说起志愿者工作，吴阿姨透露，他们“夕阳红”做志愿者工作不只一年，只不过之前做的是城管文明劝导工作。确切来说，这支队伍组建于2011年，“当时我看《中山日报》登出广告，招募文明劝导员，就到社区报名了”。许多老人跟吴阿姨一样报了名，120人的队伍一下子集结起来，活跃在大街小巷特别是小贩密集区进行劝导工作。

今年2月份，这支队伍开始交通文明引导，他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交通安全和指挥方面的培训。

一半来自低保家庭 纯属志愿没工资有补贴

“本来想让他们休息，但他们一直坚持。”东区宣传办主任卢丽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毕竟这一支队伍基本都是老者，“国庆长假还是我们硬性规定一定要休息三天，他们才休息”。

吴姨说，确实从2月份上岗以来，基本没有休息过。进入秋季后，每天上岗时间由上午7时30分到9时，下午由4时30分到6时，每天3小时。众所周知，这是志愿者队伍，“2011年登报招募时也没有



“夕阳红”公共文明引导员在引导行人



说有补贴。”不过现在每人每天有30元补贴，相当于每小时10元。吴姨的家庭经济较好，领着退休工资的老人家自然不太着紧这份补贴，“本来就想着发挥余热。”在63岁的她看来，如果身体没有病痛，能工作到70岁，“为什么不在还干得动的时候为社会做点事情呢？”

“可能以后每星期会休息一天。”说这话的时候吴姨有些许担忧，她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部分队员。原来“夕阳红”里除了一半的人跟吴阿姨一样生活无忧外，还有一半的人是冲着补贴来的，他们来自低保家庭。补贴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他们更不愿意休息。

每天行程满 志愿活动家庭事务两不误

现在年轻人都要上班，许多老年人往往要带孙子或者料理家庭。吴姨说，之前确实有不少老人以这为理由谢绝加入她的夕阳红队伍。

吴姨教她的队员们，其实可以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让志愿活动和家庭事务两不误。像她，一样需要接送孙子和忙家务，如今，她每天的工作基本都定点，排得满当当。

吴姨认为，这份引导工作虽然不见特别明显的实质性效果，但可以通过日复一日的引导和提醒，让原本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自觉遵守，“像我有时候打算上前引导时，每天都经过同一条路的人会说，‘阿姨，我知道要走行人道。’”在吴姨看来，这就是工作的意义，而夏日里路人给的一瓶水、小贩送的水果，“虽然这些东西不值钱，但这是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所有的这些，都是“夕阳红”坚持的动力。

（摘自2013年11月13日《中山日报》）

【点评】

自2013年1月起，为改善城市的交通环境，纠正市民的不文明交通行为，中山市东区带头组建交通文明引导员队伍。这支队伍是

由东区文明办统筹、由东区志愿者协会管理的一支志愿者分支队伍。在这样的背景下，“夕阳红”交通引导队聚集了一批热心公益的群众。从队员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感受到队员们对交通引导工作的热情，同时也感受到队伍组织者对队员们的关心。

参加引导队的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即便在节假日也不愿意休息。究其原因，除了群众对志愿工作的热爱外，组织者善于与群众相处，也很大程度上调动起了群众的积极性。正是队伍的组织者充分考虑到群众参与公益工作的积极性，结合现实中交通引导工作的需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效地把群众的积极性投入到交通引导之中，使交通文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活动的过程中，组织者秉着尊重群众、心系群众的原则，使队员们对交通引导队产生归属感，更加用心地开展志愿工作。例如，组织者考虑到队员们平日工作都比较辛苦，硬性规定队员放假休息，养精蓄锐，避免积劳成疾。这体现了组织对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视，表明组织者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把群众的安危冷暖系心上。另外，据《中山商报》的报道，东区文明办在每位引导员上岗前，都为他们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并定期开展联谊和培训活动。这些细节都折射出组织者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不仅尊重群众、心系群众，而且不忘服务群众。

“夕阳红”交通引导队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组织者东区文明办的成功。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用正确的群众观指导实践的巨大威力。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行动践行正确的群众观，组织群众，让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前进。



第二节 众人拾柴火焰高

组织群众要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当群众有积极性但缺乏组织时，要利用好群众的积极性，及时组织群众；当需要组织群众，群众却没有积极性时，要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善用榜样的力量。2010年6月起至今，中山市文明办在全市持续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目前“中山好人榜”已累计表彰人数达100多人。在“中山好人榜”中，有见义勇为的出租车司机，有敬业奉献的邮递员，有助人为乐的退休老党员，有诚实守信的企业老板，有孝老爱亲的普通工人……市文明办此举，为广大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楷模，“引导广大群众择善而从、见贤思齐、争先创优，在全市上下营造学习、崇尚、关爱、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为进一步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打好基础。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掌握组织的方法，把握组织的契机。群众的积极性往往与当时的情境密切相关，因此，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了解群众的心态。党员干部要善于抓住群众积极性最高的时机，动员、组织群众去做符合党的政策，符合群众心声的事情。譬如，东北沦亡、华北告急后，中山各界抗日救亡的呼声日高。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抓紧时机，领导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中山妇女抗日协会”等组织，唤起大批的民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与群众实现心与心的沟通。组织群众离不开宣传群众。党员干部要实现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互动，做到与群众以诚相待，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通过宣传工作，使人民群

众在充分了解党的政策的基础上，服从党的领导，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中，中山土改中的茶园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不小的启示。

【案例】

中山土改中的茶园经验

中山在土改工作中出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茶园经验。茶园经验是南下干部刘振本将河南土改工作的先进方法与中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茶东村、茶西村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凝聚而成。

刘振本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医疗兵，后来当了队长，随后又调到河南开展土改工作，有丰富的土改历练，总结出一套土改经验。南下中山后，刘振本担任茶园土改工作队队长，该工作队大约有20余人。茶园经验本质上是土改工作中一整套的工作程序，即工作队来到农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斗争地主、划分阶级、分田分地。现结合我（徐文泽）的实际工作经历，说一下茶园经验如何具体展开。



刘振本

工作队初进农村，要积极访贫问苦，要深入扎根贫雇农。因为他们既是土改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又是土改成功的重要依靠。事实上，最初土改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很多农民群众见到工作队进村都马上关门闭窗，不主动接受甚至



抗拒工作队的教育。因此，刘振本决定先从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改变农民群众的错误观念，进而争取群众对土改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工作队马上在村中的空地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改工作队进驻茶东、茶西村，协助贫下中农大翻身。同时，对地主集中训话，强调“三要四不对”，对地主进行约束打击。半个月之后，全县又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判决了3个地主恶霸。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农民群众才认识到工作队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能够依法惩治地主恶霸。工作队成功争取到了农民群众的信任。之后，广大的贫下中农都积极参与土改工作，打开心扉，主动向工作队说真心话，村中哪户人最穷，哪些农户可以串联，哪些是地主恶霸等等，为工作队掌握当地的真实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争取到群众信任，扎稳农村之后，第二个步骤便是串联诉苦。我们工作队串联了12个贫下中农，进行诉苦。当其中一个农妇说到自己没了丈夫，没了儿子，日常生活中也总是食不果腹的时候，引起了全场农民的共鸣，其他农民也积极参与到诉苦中来。串联诉苦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六七十人，初步实现了扎根基层，推广铺开的工作计划。通过这样的工作，广大的贫下中农充分意识到自己当前生活的不幸。在诉苦的基础上，工作队还引导农民群众思考造成这种不幸的源头——吃人的地主恶霸阶级就是造成当前不幸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广大的农民就不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不会过上饥寒交迫的生活。

事实上，串联诉苦的目的就是把苦根串联到地主恶霸身上，让农民群众认识到自身不幸的根源，地主是如何压迫我们、是如何收我们租、是如何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等，从而揭示地主恶霸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进而启发群众要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压迫人民的地主恶霸的统治。只有把地

主恶霸斗倒，才能实现人民真正的解放。通过引导、教育，土改工作得到更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的工作热情愈高，也更积极地说出了当地的地主恶霸。

前两步的工作成功开展后，后续的工作就迎刃有余了。工作队根据贫下中农反映的情况，以及自身所掌握的实际，对地主恶霸进行审判。之后，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我们要翻身做主人，需要组织的统筹规划。因此农村成立了农会，通过民主选举确定农会主席。随后进行阶级划分，根据阶级成分分田分地，建立乡村政权。这就是茶园经验。

地主阶级统治了中国数千年，如果工作队仅限于划分土地给农民，这样就无法从思想上根绝封建思想在农民心中的影响。只有通过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在思想上克服对地主恶霸阶级的恐惧，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因此土地改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真正把统治农村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封建势力推翻打倒，进而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是工作过程中的“左”的现象，实际上是忽略了其对牢固建立农村政权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把农村的封建残留推倒。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斗争地主、划分阶级、分田分地。这一整套的茶园经验是由省农村部专门派人来中山，了解茶园工作队的优秀经验方法，提炼而成并亲自形成文字报告的。

（徐文泽口述，梁智昌整理）

【点评】

当群众积极性不高，组织工作无从入手时，刘振本选择了从宣传工作着手，打破群众的重重疑虑，获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调动起群众参与土改工作的热情。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局面便也打



开了，在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之后，群众工作热情日益高涨，工作队抓住这一时机，继续开展斗争地主、划分阶级、分田分地等后续工作，并在恰当的时候引导群众，巩固胜利的成果。

在徐文泽所讲述的茶园经验中，有两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一是贫下中农主动向工作队说真心话，一是孤寡农妇诉苦引起全场共鸣。工作队在进行土改工作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因而他们主动向工作队说真心话，把村里的情况如实告知工作队，为工作队提供了地主恶霸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工作队的言行，使村里的农民清楚认识到，土改队确实在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随着群众对土改队工作的信任加深，积极性自然也就调动起来了。另外，在扎根串联一环中，一个孤寡农妇的诉苦，引起全场农民的共鸣，使他们争相向工作队诉苦。显然，农妇的遭遇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在场的农民纷纷放下防备，敞开心扉。农妇在这里相当于“榜样”的角色，使其他人在榜样的带动下，积极向工作队诉苦。

工作队在茶园组织群众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党员干部要积极学习茶园经验，用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用科学的方法组织群众，切实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并利用好群众的力量。

第三节 一个好汉三个帮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自己扎根基层的优势，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还需要加强对群团组织的领导，还需要群团组织的帮助和大力支持。

群团组织主要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它们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进青年、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性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新颁布的十八大党章，延续了党重视群团组织的传统，规定“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党对群团组织的重视早已有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就曾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妇女们在“妇协”的组织下，参加各种支援抗战前线的组织，如宣传队、救护队、挖掘队、大刀队等。由于组织得力，“妇协”在维持治安，保卫群众的财产，救护伤员，宣传抗日，激励士气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妇协”的身上，我们充分看到群团组织组织群众的力量。

【案例】

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在抗日战争中积极作用

县“妇协”在中共中山县委的领导下，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首先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各种支援抗战前线的组织，如宣传队、救护队、挖掘队、大刀队等。五区全区都成立了大刀队，妇女也纷纷参加，仅乌石村就有50多名妇女参加大刀队。她们早起操练，晚上学文化，宣传抗日救国。当日军飞机空袭时，她们与男队员一起维持治安，保卫群众财产，在群众中反映很好。一次，妇女大刀队为激发驻军的抗日热情，发起向当地抗日驻军献刀。营长率队参加受刀，场面非常热烈，当女大刀队员向营长献上大刀时，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参加受刀的军队肃立宣誓，坚决抗日。为适应战时需要，各区“妇协”有针对性地培训救护队员，使队员



们很快学会了使用药品、外科用具，伤口消毒、止血、包扎、打针等普通救护常识。当日本军队准备进犯中山时，“妇协”与“抗先”一起组织会员和挖掘队队员，并发动群众到洪奇冲口投大石以封锁海口，又将60公里长的岐关公路分段挖开，以阻止日军进犯。当时日机一再轰炸石岐，一区妇女救护队在县“妇协”的带领下，提起救护箱和担架，冒着弹雨抢救受伤同胞。日机轰炸安栏街时，火势特别猛。长洲妇女在黄筱坚、黄颖嫦的带领下，与男同志一起推救火车扑救大火，从下午一直至晚上十一时许，滴水未喝，一心抢救同胞和人民财产。此外，每当日机轰炸八区乾务一带时，八区“妇协”带领着救护队，立即奔赴现场抢救被炸伤群众，为保护人民财产，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

1939年夏、秋间，日军海、陆、空三军两次向中山横门进犯，在支援横门守军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妇协”组织了宣传队、救护队与“抗先”的兄弟们一起奔赴前线，负担着支前和救护工作。一区的黄颖嫦经常往返于前后方送情报，黄惠芳带着慰问队，送慰劳品和慰问信到前方劳军，对前线的抗日将士鼓舞很大；四区的程桂卿（罗曼萍）、程瑶卿（程萍）、谭多等一批女战士还与守军一起开赴前线，承担起战地抢救伤员的任务。两次横门保卫战在全县军民齐心合力的反击下，终于击退了日军的侵犯，取得胜利。

（摘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抗战纪实》）

【点评】

群众抗日离不开群众组织的引导。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组织群众参与到支援抗日的实践中，使我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从“妇协”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进步妇女们为抗日义无反顾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斗志，看到了她们对普通

群众的带动和组织作用，看到了群众组织沟通党和群众的桥梁作用之巨大。事实证明，加强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发挥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是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也必须跟上形势，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恰当的领导方式，确保群众组织保持良好的状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小榄镇老年人协会就是在新形势下新出现的群众组织。

2009年，小榄镇为整合全镇各老年服务组织，推动老年服务的发展，促成了老年人协会的成立。该协会是由该镇老年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群众组织，致力于响应“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事业方针，切实推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为促进小榄镇老龄事业发展服务。

小榄镇老年人协会是组织群众的一个典范。在协会的组织下，小榄镇的老年人过着安心、充实而快乐的生活。镇政府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切实解决该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问题，通过充分发挥老年人协会这一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倡导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带动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的热情，很好地组织起群众解决该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为达到使老年人老有所为的目的，协会积极开展各种志愿活动，组织老年人参与其中。《中山日报》曾对此事进行报道：

由协会牵头组织，成立老年人志愿服务队伍。目前，小榄镇各社区分会志愿者有3663人，其中老年人458人。志愿者协助开展街坊组长联系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街坊组长715名，其中老年人街坊组长438名，这些老人全是不受薪的积极分子，他们承



担逐户派发宣传资料和通知、协助社区了解社情民意、反映群众热点问题、向居民宣传有关政策法规等志愿服务，积极为居民排忧解难。

该镇在2007年建立街坊组长制度，在各社区以街巷、自然村落、组、片或一定数量住户为单位，设立街坊组长一名，主要职责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精神、协助社区传达各项管理制度、措施，负责社区与群众之间的上传下达工作、收集群众意见，及时反映社区居民的合理意见和诉求，协助社区处理群众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全镇各社区根据工作实际，建立街坊组长沟通汇报制度和跟踪落实的长效机制，定期召开“街坊组长”座谈会，对群众提出的诉求及时跟进处理。

上述报道不仅展现了老年人协会在组织老年人发挥余热中的作用，更启示党员干部，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使广大群众有组织、有目标地为自身的幸福、国家的前途而努力。



第六讲

服务群众 鱼水情深

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56年9月16日)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坚持走群众路线，最核心的就是服务群众，它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邓小平曾说过“领导就是服务”，这句话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本质。新时期新形势下，世情、国情都呈现新特征，出现新变化。党的群众工作也同样出现了变化，例如群众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群众工作对象多层次。因此，要树立服务群众的观念，时刻意识到服务的重要性；要不断深化认识，学会换位思考；要打造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和平台，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只有实实在在地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办好事，才能得到人民群众朴素、真切的拥护和爱戴，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第一节 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民之所想、办民之所需、解民之所困，既是党的工作基本出发点，也是每个党员从事群众工作的最基本的



工作立场。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案例】

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2013年，中山十项民生工程首次由全体市民投票决定。“民生工程年年在做，怎么能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今年我们试图有个转变，就是变‘政府配餐’为‘群众点菜’，确保把好事办在老百姓的心坎上。”中共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充分肯定了中山市今年十件民生实事评选活动。今年的十项民生工程进度如何？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呢？

十件民生实事完成率达到年初既定目标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市的民生财政支出为78.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1.5%，高于全省5.2个百分点。十件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完成率达到并超过年初既定的目标。

为了让民生工程更加体现市民的意愿，今年市政府把十件民生实事通过中山日报等市属媒体，广泛征求市民意见。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各大媒体陆续开通“2013年我心目中的十件民生实事”投票渠道，由市民从18个备选项中，选出自己最希望政府着力解决的事项。通过民意征集，市政府将更有效地推进民生实项目的建设，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最后综合各大平台的投票，得票靠前的十件民生实事包括，实施“全民治安”工程，加强对农贸产品的检测和监管，逐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率，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完善镇区至城区的大站快线网络，继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整治城区内河涌，加快推进

岐江河环境整治工程，加快田心森林公园、西区彩虹公园等一批公园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机制。

最终，2013年十大民生工程及目标定为：实施全民治安工程，创建平安村居等，新建整合一类治安视频监控点1200个、高清治安卡口48个；做好综合治水工作，雨污分流中心城区主干管网开工建设32项、完成40公里，市政污水管网开工建设13个片区、完成117公里，支管到户开工建设30个片区、完成10个片区。19个镇区完成第一批32个村（社区）雨污分流任务。推进岐江河水环境整治二期工程；提高道路畅通能力，加大力度打通镇际未连接的重点道路，确保年内打通一批、推进建设一批、规划落实一批；加强食品药品管理，做好“放心菜”生产基地、无公害生产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等监督管理，推进标准化生产；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待遇；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推进助困养老服务；促进农村和谐发展；优化积分服务管理，拓展异地务工人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广度深度，积分制向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险延伸，简化申请审核流程；完善群众文体设施等。”

据了解，今年部分民生工程已经取得成效，其中强力整治19条



负责雨污分流的
工程人员正在施
工中



镇际“断头路”，目前已有10条动工，其余正在做前期工作。“绿化大提升”三年目标两年实现，累计投入资金32亿元，其中社会投入占6成左右。据国家环保部监测报告显示，今年6月份我市在全国首批实施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中排名第三。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岐江河水环境二期整治工作扎实推进，母亲河水质逐步改善。在2012年度全省各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中，我市位居第一。据《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显示，中山幸福指数排名居全省首位。

新老中山人共享发展成果

在民生投入上，今年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近几年市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市级财政6成以上用于公共产品。去年民生财政支出154.8亿元，增长14.8%，高于生产总值增速3.8个百分点，占支出比重提高到72%。建立以助医、助学、助房、助老、助残为主要内容的“一保五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3%，达到每人每月430元。

实现幸福和美的“中山梦”，必须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持续增进群众福祉，以富民惠民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中山坚持共建共享，推进“生活进城”。市财政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从2003年的45.67%上升到2013年的68%，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加额9成以上用于民生保障。以“同缴费、同待遇、同管理、同服务”为指导，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和城乡统筹就业全覆盖。目前，全市城乡参保居民住院报销额最高可达35万元，报销比例最高达80%；达到退休条件的农村居民每月可享受养老金600元以上；城乡低保户统一每月补助430元。

顺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山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

实推进十件民生实事，突出抓好治水、修路、种树、交通、就业、教育、市内相对贫困等重点工作，力争在学有优教、劳有丰酬、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努力实现民生决策从“政府配餐”向“群众点菜”转变，民生支出从“舍得花”向“花得好”转变。尤其是在投入30亿元实施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程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镇区雨污分流工作，加快岐江河二期综合整治，让岐江河早日重现“鱼翔浅底”的美景，让广大市民早日重圆“中流击水”的好梦。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完善异地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安排，稳步推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向异地务工人员覆盖，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使全体新老中山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各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

在治水方面，今年列入十项民生工程的雨污分流工程，要求“雨污分流中心城区主干管网开工建设32项、完成40公里。19个镇区完成第一批32个村（社区）雨污分流任务。推进岐江河水环境整治二期工程”。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目前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程主干管网已有13项工程开工，完工1项，累计完成管道长度10.9公里；泵站开工4项；市政片区污水管网开工13项，累计完成管道长度3.6公里；支管到户工程开工18个片区，累计完成管道长度56.9公里。支管到户排水户档案资料建立中，主城区排水管线信息管理平台已完成装机调试正进行运行测试。

岐江河二期工程试验段的悠闲人居带已于今年4月底动工。待整个项目建成后，将建成包括张溪河口公园、沙咀湿地公园以及龙舟公园在内的3大主题公园与8大景观带。岐江河滨水景观工程二期



(员峰桥至长江北路桥段) 在功能布局上形成“一核心、三大主题圈、多景点”的空间结构，三区从南向北分别是休闲文化区、社区生活圈和生态发展圈。整个规划定位是将该区域打造成历史、文化、生态、游憩廊道叠加而成的城市特色风貌带，并营造复合防洪排涝、旅游航运、商务服务、文化休闲等功能，具有南国水乡特色的现代滨水景观带。

全民治安推进平安建设

去年（2012年）3月22日，中山市正式启动“全民治安推进平安建设”，通过充分发挥群众在平安建设上的主体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果。据日前公布的《2012年广东省群众安全感和政法工作满意度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中山市民的安全感排名全省第三，市民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列全省第一。同时，调查还显示，中山市为全省“赌博犯罪”及“抢劫犯罪”案件发生次数最少的地市之一。

今年以来，中山将“全民禁毒”列为“全民治安”的一号工程。通过采取“大收戒、大审讯、大抓捕、大举报、大宣传、大管控”的措施，有效破解了毒品带来的社会治安难题，全市抢劫、飞车抢夺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6.1%和29.37%。我市通过制定《中山市涉毒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公开举报方式，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举报、扭送吸毒人员。今年以来，共收到涉毒举报线索1443条，查证抓获吸毒人员1238人，发放奖励金近60万元。据介绍，上半年，全市查处吸毒人员同比上升1.3倍，查处率全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同比上升1.2倍。在校园安全上，学校的“三防”保障也相对要求更高：人防建设方面，要求学校都按标准配备保安员，并由分局定期组织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物防建设方面，学校要配备防暴钢叉、丁字棍、盾牌、抓捕器等装备；技防建设方面，建成视频监控系统和紧急报警系统，并接入分局110报警中心，在校园内形成视频监

控全覆盖。目前，全市已有90%的学校实现“三防”措施。校园周边，按照“见警车见警力见警灯”的要求，警方在学校上学、放学、晚自习等重要时段进行驻守；同时，指导学校组织发动教师、家长、保安员等力量成立“护校队”。

在优化积分服务管理上，中山计划拓展异地务工人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广度深度，积分制向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险延伸，简化申请审核流程。目前中山首批异地务工人员通过积分申请政府公租房已经在公示，经过公示后，首批83户异地务工人员将住进政府公租房。

（摘自2013年8月27日《中山日报》）

【点评】

从“民生工程”到“民心工程”，虽然一字之差，却意味深长。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搞“民生工程”，听起来很美，但结果却是“剃头挑子一边热”，政府热百姓冷。究其实质，就是那些“民生工程”一味强调长治久安，只关注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对群众渴望的立竿见影式的短期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却兼顾得不够。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是“民生工程”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需要统筹，不可偏废。兼顾得好，“民生工程”就鲤鱼跳龙门，质变成“民心工程”；兼顾得不好，“民生工程”就倒退成“民怨工程”。当民怨沸腾的时候，即使你在做造福子孙、造福千秋的伟业，群众也不领情。

如何兼顾好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如何从“民生工程”飞跃到“民心工程”呢？变“政府配餐”为“群众点菜”就指明了方向。这是角色的转换，由政府当主角变为群众当主角，这是新形势下“公仆”的归位以及民主的体现。顺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节 你是风儿我是沙

1939年初，毛泽东同志主持编撰干部教育教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审阅文稿时，看到其中一个章节的阐述中，运用鱼和水来比喻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大笔一挥，写下了“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的批示。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将党群关系比喻成血肉联系。1989年12月2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鱼水关系”还是“血肉联系”，都形象地阐明了党不能脱离群众，党和群众密切联系、唇齿相依的道理。

【案例】

崇高的白衣战士刘帼超

刘帼超，原籍广东省新会县，1908年生于澳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幼年丧父，她与母亲相依为命。以针线手工度日，生活寒苦。刘帼超六岁那年，叔父欺她们孤儿寡母，以女子无继承权为名，要强占她们居住的小木楼，母女二人为此打了十年官司。由帝国主义者把持的法庭，坚持维护封建礼法，使她们屡次败诉。最后，她母女虽然赢了，但诉讼费用却要卖掉小木楼才能偿还。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在刘帼超稚嫩的心



刘帼超

灵里，很早就刻下了印痕。

1927年，刘帼超离开澳门只身到外地求学，她先到香港，师从岭南画派开山祖高剑父学画。不久，她觉得民族灾难深重，绘画不是当务之急，于是，转而考入广州市妇孺产科学学校学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也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籍强烈地叩动了她的心弦，使她深深同情那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更仇恨那些恣意蹂躏百姓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阶级。她久久地思索着：人不能独善其身，还必须造福于人民。于是，这位外表娴雅，沉静寡言的少女暗暗下定决心：毕业后要到穷乡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劳苦大众。1929年秋，刘帼超从妇产科学学校毕业，她把一大捆医学书籍和全套鲁迅全集装进行囊，毅然辞别母亲，来到中山县一个缺医少药的穷乡村——三乡，开设了博爱医局。她在这里积极宣传，推广科学接生法，走乡串巷为儿童免费接种牛痘，给穷苦人赠医赠药……从此，当地产妇、儿童由于旧法接生和不科学的免疫法而导致的常见病便逐渐消除；并且有不少久病不愈的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从此，三乡人民感激、热爱这位把爱心掏给了他们的白衣天使。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在党的领导下，中山县各种抗日团体如抗先队、大刀队、别动队、救护队等纷纷成立。刘帼超医生勇敢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白天，她与救护队员们一道冒着炮火奔走各乡，抢救被炸百姓，出入于难民棚治疗逃难中倒下的难民；晚上，她给救护队员们讲授战时救护常识，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民族义愤在她心中燃烧，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自己。

1940年，中山县沦陷，三乡成了岐关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日、伪势力盘踞在这里。但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在这一带采取“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的方针，继续进行着抗日救国的斗争。1942年，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部队挺进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从此，这里就成了珠江三角洲抗日斗争的中心。

刘帼超医生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不屈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她积极靠拢党，把为党工作看作自己的责任。刘医生的医局设在镇上，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了我游击部队的秘密后方医院。五桂山区游击队的同志们，负了伤、染了病都到这里来医治。他们有时候化装成老百姓来医局看病，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的地下伤兵站，由交通员领着刘医生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治疗。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夜半三更，交通员一到，刘医生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游击队的同志来就医，她从来不要报酬，不收医药费，甚至连伙食费都包起来。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刘医生还经常炖补品给他们吃。刘医生时时把同志们放在心上，积极想办法为患病同志治疗。王河同志患了严重肺炎，经常咯血，当时肺炎是不治之症，刘医生查阅了许多医书，研究了一些民间土方，药物治疗与食物治疗结合，四个多月后，王河同志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谭桂明同志患的恶性疟疾，叶向荣同志患的腱连疮，欧初同志患的长期感冒……都在刘医生大胆而又细心的治疗调理下痊愈了。部队中的女同志在刘医生的医局里分娩，更是得到刘医生最细致的照顾。刘医生的医局成了战士们的家，刘医生像母亲般给予战士们亲切的抚慰和调养，战士们在这儿重新获得生命和力量，又活跃在抗日斗争的战场上。

战士们信赖刘医生，尊敬刘医生。刘医生也把他們当作亲人，自觉承担义务和责任。有一段时期，部队生活很艰苦，缺乏营养，战士患了夜盲症。一天晚上，三十多个患夜盲症的战士，由一明眼

者领着，一个一个牵着衫尾，连夜翻山越岭，走了几小时，来到医局找刘医生。当时药物奇缺，刘医生采用土方“百草霜”给他们治疗。当这批战士病愈后，刘医生向部队司令部提出建议：宁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发生。部队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订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钱和菜金分开，保证每人有一定份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了患病率。这对经常夜间行军、袭击敌人的游击队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刘医生的医局不仅是部队的医疗所，也是安全的掩蔽所。1943年，刘医生夫妇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选择一个水陆交通方便而又较为僻静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取名为“桂园”，桂园内一棵桂树也没有，名字是取自游击队根据地的五桂山，寄托了他们对党的感情。医局迁到桂园后，游击队常利用这里作掩护。每逢敌人扫荡，刘医生就把一些伤重、病重的同志作为留医病人留在医院里，保护了我们的同志。在形势最险恶的时候，五桂山区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欧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还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帼超医生成了珠江游击队一个得力的助手、可靠的同志。每当同志们向刘医生表示感激的时候，她总是深情地说：“你们不惜为国捐躯，我为你们治病是医务人员的份内之事，我只是尽了一些责任而已。”

1944年，何明同志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个孤女，巢健同志的爱人北撤了，身边有个三岁多的男孩拖累着。她们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找个人家抚养，以便轻装上前线。党组织找到了刘医生，刘医生欣然同意。孩子送来后，刘医生又领回两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以兴办育婴堂的名义掩人耳目，抚育这些孩子。后来，刘医生又陆续收养了一些烈士的遗孤，以及乡中一些孤儿和公路旁被丢弃的孩子。最多的时候，桂园里的孩子，连刘医生的几个亲生女儿，共有



二三十个。从嗷嗷待哺的乳儿，到五六岁的孩子都有。

刘医生把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她医务工作繁忙，便将孩子们交给自己的义妹照管。但她并没有少花一分精力，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她按时给他们种牛痘，打预防针，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后，她又亲自巡视几次。她经济条件不宽裕，为了抚育婴儿，她养了几只母羊，用羊奶喂养孩子，还动员乡中乳汁多的产妇兼喂他们；对大一些的孩子，则经常买些廉价的牛骨头加黄豆熬汤给孩子们喝，以增加蛋白质和钙质。

刘医生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她在桂园内养了小兔子，种了花木和青菜，让孩子们每天给花木、青菜浇水，采割青草饲养小兔子，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刘医生还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诚实，爱学习。有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姑娘黄莲英钦佩刘医生的为人，自愿留在桂园帮助她教育孩子。孩子们就在黄阿姨的带领下，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听故事，还上识字课。附近的孩子也常常来桂园和他们一起读书认字。桂园内还建了简易的儿童游乐场，有滑梯、跷跷板、沙池等，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整天充满着桂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桂园成了这些曾被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孩子们的乐园，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这儿找到了第二个母亲，他们在这位慈母温暖的怀抱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刘帼超医生的一生，是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生，她热爱党相信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威逼利诱面前，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革命，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崇高的白衣战士。

（摘自《中山文史》第14辑）

【点评】

刘帼超医生不是中共党员，她是一位港澳侨胞，宗教界人士，她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但她基于爱国意识，基于民族大义，基于对中山抗战的中流砥柱——珠江抗日游击队的敬佩，不断冒着生命危险，用她精湛的医术，一次又一次地救治抗日战士和群众。其崇高的品格，赢得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革命群众中的一员，刘帼超的进步离不开党的宣传和领导。她和我党的关系正是党群鱼水关系或血肉联系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离开了土地，种子不能生根发芽。离开了种子，土地则是荒芜一片。因此在今天，党员干部只有对人民充满感情，才能更好地换位思考，站在群众的立场干事创业、布局谋篇；只有将群众当成亲人，而不是将自己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才能建立融洽如一家的和谐氛围。“一片真心换民心”，把群众视作亲人，群众才会信任你、拥护你。

第三节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服务群众，要真心实意，更要讲究方法，善于开动脑筋。与群众打交道，为群众办实事，方式方法很重要。群众与你谈起“柴米油盐”，你不能只会文绉绉地说起国家大事。工作中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以符合群众思维习惯、喜闻乐见的形式交流、宣传、教育和服务。群众工作是一种实践，服务是在日常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深化和推进的。因此，要顺应群众的需求，倾听群众的意见，



向群众学习，逐渐把握群众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在实践中提升水平，在实践中锻造能力，服务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案例】

西区彩虹社区创新建立社区干部“家访制”

针对群众反映的信访热点难点问题，西区创新建立了社区干部“家访制”，每位社区“两委”干部每年的家访对象不少于60户。去年（2012年）至今，该区53名社区“两委”干部共家访了3984户群众，收集意见建议1556条，为社区群众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

许少鹏说，彩虹社区通过“家访制”，为热心人士与贫困户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得热心人士与贫困户喜结对子。“有些企业家有热心助人的意愿，但一直找不到帮扶对象，我们社区干部通过入户走访，细致了解民情，进行登记，热心人士通过社区找到帮扶对象，从而形成以服务老年人、特困户、低保户、患病人员等重点，积极开展社区关爱弱势群体的‘一帮一’扶贫工作。”许少鹏说，现在已有30多个热心人士与帮扶对象结成对子，社区联合企业老板、热心



彩虹社区工作人员家访

人士、社工、志愿者等带着慰问金和慰问品上门走访，了解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关心和帮助贫困群众。

“现在还有不少企业家有时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求提供帮扶对象，”许少鹏高兴地说。社区爱心人士同困难家庭聚集在一起，使得困难群体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怀，形成互助互爱互相支持的氛围，使社区氛围更和谐。

据许少鹏介绍，彩虹社区还针对53个开放式小区开展“志愿管家”创新社会管理新方式。目前，“志愿管家”人选200多名，对社区工作和管理非常热心。许少鹏说，针对开放式小区存在的居住人口多、结构复杂的特点，“志愿管家”创新模式的开展有效解决了开放小区无人管理“真空”的问题。

（摘自2013年11月19日《中山日报》）

【点评】

如果说党的领导就是服务的话，那么作为自治性组织的社区，其存在的目的更是服务群众。西区彩虹社区在服务群众、帮扶群众工作上，成功地动员了大量热心人士和热心老板加入进来，从而改变过去社区党员干部帮扶群众的单一模式为社区党员干部帮扶群众及群众帮扶群众的双模式。

模式的改变带来了许多良好的效应。一是成功实践了“先富带动后富”。先富起来的热心人士和热心老板，在面对面直接帮扶困难群众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贫富差距过大对心灵直接冲击的震撼。另一方面，没有了近年来被无限放大的郭美美效应的担忧，畅快淋漓地从金钱至上阴影中解脱出来，体味到助人为乐的愉悦和人生的价值，真正实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的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层次，思想得到升华。据说，社区工作人员在开始联系企



业老板、经理等参与家访时，他们兴趣并不大。但家访过后，他们跃跃欲试，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如慧达教育的钟先生表示“活动很有意义，也很实在，很高兴能够尽一份力量和心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以后会继续参与这样的活动，为社会献一份爱心”。

二是极大地消除了“仇富”心理。困难群众得到热心人士和热心老板的帮扶，那种感激是空前的。因患有哮喘病常年需要吃药而无法工作的杨长连女士对于热心老板及社区工作人员的慰问表示由衷的感谢。她感激地说：“我只是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可是政府、社区还有社会人士却这么关心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真像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让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谢谢！”

三是不仅热心人士，包括社区工作人员也在帮扶中得到了自我思想改造。通过家访，社区工作人员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怨言减少了，责任感增强了。在慰问中更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满足。



第七讲

师尊群众 问计于民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从中共党史来看，不少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影响时代发展进程的伟大改革、杰出创造、重大发明或重要贡献，往往首先来自于人民群众，原创于人民群众，发端于人民群众。从农村“大包干”到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到大规模群众参与的自发性活动等，都是如此。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源头活水。他们的创造性活动，经过总结、概括和升华，迅速推开，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凝结成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事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冷暖甘苦感受最深刻。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源泉，改革发展体会最清楚。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唯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需于民方知冷暖，问计于民方知虚实。如果不闻不问、闭目塞听、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那么，制定的政策就难以体现民意、实现民利，作出的决策就难以做到民主、科学，所想往往非民之所想，所急往往非民之所急，所办往往非民之所需，所干往往非民之所盼。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



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固有的，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谁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突出的成绩。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要虚心求教，从谏如流，让群众敢于说话，敢于说真话。这样才能集纳民智修正过失，及时进行查漏补缺，少走弯路。要耐住性子，多花时间精力研究群众语言、群众思维、群众方法，踏踏实实地多学群众工作的实招，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摸索群众工作的路径，找到群众工作的方法。要常关注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基层实际，有没有真正给群众带来实惠，真正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基层工作的“记分牌”、正确与否的“化验单”。

第一节 要知山中事 乡间问老农

从广义上来说，“以群众为师”，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问题，更是一个考量党性的作风问题；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服务群众的宗旨问题；不是具体指向哪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求各级干部都要在实践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创造的经验。如果没有树立人民至上的意识，没有把群众当亲人的情感，没有走进百姓的情怀，是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也不可能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作风虚浮，服务意识淡薄，不关心群众的所思所盼，不体味群众的酸甜苦辣，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发号施令，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到了脑后。一些党员干部，信

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工作的动机和目的不纯洁，唯上不顾下，习惯于以领导高不高兴为出发点，而群众满不满意则不管。一些党员干部长期在机关，缺少对普通群众生活的切身体验，又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工作拍脑袋、想当然，习惯于凭感觉、靠经验做事，丢弃了向基层学习的好机会。归根结底，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根源都在于没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没有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并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身体力行，十分注重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直接促进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理论进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并最终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拜群众为师，必须要端正思想态度认识。要有诚心，克服高人一等的优越心理，降低身段、俯下身子，真心实意甘当群众的学生，将口头上的言辞转化成内在的行为自觉；要有虚心，不能自以为文化程度比群众高，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向群众多请教，切实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有恒心，向群众学习求教是一项长期的必修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到持之以恒，在与群众长期朝夕相处、摸爬滚打中培养感情、取得真经。

【案例】

港口乡五十年代水利工作追忆

港口乡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中山一区，土改后划为十一区，1957年撤区并大乡仍称港口乡，1958年后改港口公社。1949年10月底中山解放，11月初，我（李浩）以一区支前指挥所副主任兼工作队长的



名义，和工作队同志一起到港口开展筹粮、剿匪、恢复生产的工作。以后一直留在港口至1959年底才调到县上工作。

港口是纯沙田区，1957年撤区并乡后的港口大乡，耕地面积共69945亩，其中围田约55000亩，潮田约15000亩。解放前围堤失修，水患连年不断。1949年全乡就崩了24个围，淹没禾田18532亩，占耕地面积23.6%，减产200万斤。全乡最大的马大丰围面积2000亩，水患不绝，农民有“马大丰，十年耕种九年空”之谣。当时全乡平均亩产最高不过370斤。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汛期开始，港口乡农民就按县委指示第一次组织起来抗洪抢险，保住了全乡的大小围堤，取得了抗洪斗争的初战胜利。

该年秋收后，全乡展开了冬修水利的高潮行动。以后每年冬修和汛期防洪就形成了全民治水的制度。十年来再没有出现决堤崩围的现象。特别是1955年冬至1956年春，全乡在合作社高级化的基础上，大兴水利，把万余亩潮田全部改成围田，改变了历来任凭潮水自流灌溉，高田受旱，低田受浸的落后面貌。又把全部围田的排灌系统，全面整治，实现排灌系统标准化，实行合理用水。把挣稿田、单造田全部实行翻耕化。这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由1955年亩产531.5斤增为607.3斤。1957年是台风洪水最严重的一年，不但没有减产，全乡亩产还达到642斤。1958年早造水利条件和耕作技术进一步提高，全乡实现了水稻良种化，基本消灭了水稻三化螟为害，取



中顺大围西干堤

得了一造亩产超400斤的大丰收。夏收前，中央农业部就在港口召开了两次现场会议，一次是全国种子工作现场会议，一次是南方5省防治三

化螟现场会议。夏收夏种后生产形势本来也是很好的，只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犯了主观主义盲目冒进的错误，大搞翻秋直播、高度密植，以致造成严重的不应有的损失。

搞好水利发展生产是农民的宿愿，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1950年初港口的农民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租，群众发动起来大搞春耕生产，连恶霸、大天二长期霸耕和逃亡地主抛荒的近万亩土地，都全部插上了秧。我们根据县委指示，在汛期前组织农民做好防洪抢险的准备。广大群众一经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推举了一批有经验的农民组成了一个机构——港口水利会。公举水利能人苏和礼做水利会主任。汛期逼近，围田分散，堤浅漫长，在这条破烂不堪，久不设防的战线上，怎样打好这防洪抢险的第一仗呢？

工作队和水利会一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订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那就是：把力量部署上大围为主，险段为主，固定守险与流动巡逻相结合。分区指挥，各负其责与互相支援、集中突击相结合。防洪队伍的组织，则根据港口农民集中居住、分散耕种，插花田、吊耕田多的特点，实行打破耕地界限，改变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状况，决定全乡统一组织一支“救基队”，全民动手，义务劳动，由水利会统一安排。大围设分队，小围一个或几个设一个小队，由水利会选定有经验的农民担任分队和小队指挥。汛期前补修险段，洪水到来时，布置足够力量固守险处，另派小分队流动巡逻，一方出险，四方支援。防洪器材由退租果实中拨些款购买外，主要依靠社会支助。计划议定后，一经发动，全乡2000多户农民，港口镇100多商户，热烈响应，组成队伍，一清早带着工具，带着饭食，步行或乘艇到指定地段，展开培堤护险的工作。圩镇的工商户自动捐献了大批桩杉、谷围、泥围、麻袋等器材，满足了防洪的需要。这一年洪水来得特别早，但我们把工作做在前



头，农历三月二十三的“娘妈水”，只冲崩了缸瓦沙烂六顷的一个小围，不到1个小时就完全堵好，秧苗一点没有损失，全乡围堤险段安危度汛。接着农历五月的“龙舟水”，大围小围没有一处出险。在庆祝抗洪胜利之日，东西街两岸和港口江面，数千群众，欢欣鼓舞，“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彻全乡。

抗洪初胜启发了我们，使我们看到了广大农民对治水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秋收之后，我们就组织了全面修筑围堤的行动，苏和礼是这一行动的倡议者，又是“总工程师”。这位在旧社会饱受剥削的老雇农，从长年飘流无定的雇工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与洪水作斗争的经验。哪里曾经决堤，哪里是偷岩险段，哪里有暗涌（俗称转水帘），他都了如指掌。现在是当家作主的时候了，50多岁的老农民焕发出青春的光辉。他每天清早带着一条丈竹，一把算盘，一副笔墨，一束竹签，从西街家门出发，逐个围深入细致地进行勘察，定出措施，写上竹签，插于田头。哪里要加高培厚，基底、子基长度、高度要求如何，土方多少；哪个险段需要内外打桩加固或加建围堰，土方多少；哪里有暗涌、有漏洞、需要特殊处理，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写过一首《赞苏和礼》的长诗，其中有句：“起早摸黑走百里，万丈围堤寸寸巡”、“土方一一树标签，处处施工皆说便”，是一点不假的。

苏和礼的治水措施是切实可行而有效的。他在土改分田前，提出设置水利留用地不作分配的建议，就得到群众赞同，县委批准实施，在后来的抗洪和水利工作实践证明，苏和礼这一建议确有先见之明。

（摘自《中山文史》第49辑）

【点评】

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影响，中山历史上洪、涝、旱、咸、台风、暴潮等灾害交错出现，水利工程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关系着各项生产工作的开展。在民国时期，受物力、人力、财力以及专业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影响，许多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较差，被群众戏称为“玻璃围”，难以发挥抵御洪涝灾害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县委统一领导，为水利工程提供了充裕的硬件保障，确保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按时保质竣工。在应用水利专业知识方面，中山县委既高度重视各高校、工程院的学院型知识，又不忘请教群众的现实经验，实现两者统筹兼顾，共同指导水利工程建设。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岭南水乡，中山境内河网密布。中山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都必须与水打交道，由此积累沉淀了丰富的水利经验。这些经验或缺乏体系，或语言粗俗，或方法方式简陋，但共产党人不应因此心生优越感，闭塞言路，拒绝群众的优秀经验，而应是端正态度，广开言路，认真倾听，虚心采纳，把苏和礼们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总结，升华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指导我们工作。水利建设如是，其他工作亦然。

第二节 撒网要撒迎头网

“撒网要撒迎头网，开船要开顶风船。”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作、生活中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拥有蓬勃的首创精神。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植根人民、依靠



人民、服务人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不断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经验中汲取营养，获得动力。

党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总结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升华提炼出来的，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心血。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自己开辟认识之源。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需要群众的首创精神；解决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群众的首创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也需要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发展，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事业就会一筹莫展，一事无成。

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增强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性认识，从本质上认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真正发自内心地“拜群众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不等于领导干部无所作为，要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在于支持群众的创造，参与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多听听群众怎么说、多问问群众怎么看、多请教群众怎么干，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同时以之宣传、动员、指导人民群众从事新的实践，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案例】

板芙里溪：广东小岗村

里溪村原是板芙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位于中山板芙镇和神湾镇交界的一座大山脚下，村里只有一条长达2公里的泥路连接外面的世界。与中国其他乡村一样，贫穷、饥饿与效率低下一直盘桓在里溪村的上空。当时里溪村有6个生产队，上午8点半，等到生产队长打钟催工了，人们才懒洋洋起床到田里工作，10点半收工，一天才工作4个多小时。大家来到田间，把锄头一放就成了“三只脚”。有人不会抽烟，但为了偷懒也端起水烟咕噜咕噜地抽起来。那时是按工分分配，分三个等级，等级之间只差一个工分，每工分2分钱。无论个人出多少力，月收入都差不了多少。这种“干多干少没两样、干与不干基本一样”的分配机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社员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国家划定的《纲要》是每亩年产量800斤，但每队产量平均只有600斤，除了上缴100斤公粮和450斤义粮外，所剩无几，村民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缺粮户、困难户达到30%。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的村民一到夜里就到田舍里偷稻谷、甘蔗和番薯，把村里的治保会主任忙得团团转；有的就偷渡到香港、澳门，最后全村270户人家中有30%偷渡去了港澳。为了村民能基本填饱肚子，村里每年都要厚着脸皮到邻村和县（中山1984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里去借粮，这就是1975年林德成接任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窘境。

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冲破思想束缚，打破传统生产分配机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在当时的中国，教条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政治挂帅、阶级



斗争为纲的方针不变，这就导致这个时候任何政策、措施的变动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而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改革需要很大勇气和决心。

为了解决里溪村粮食生产效益不高的问题，林德盛召集村民开会商议。村民们表示再不变更生产模式就会饿死人，新中国成立初土地分到户，家家都富足。今天为了吃饱肚子，我们也干脆单干。村民的意见得到了林德盛的支持。

针对改革的方式，当时有人提出要包干到户，或者包产到户，但因政治风险太大，被否决了。最后经过商定，实行包工到户：即除草、插秧、施肥等工种包给各户完成，还是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统一耙田、排灌、分谷种、下秧。这样一来，以队为基础没有改变，分田给农民承包产量，超产奖励减产罚，奖罚各是50%，这是一种在现有体制之下的权宜做法，尽可能地减少政治风险，同时提高生产效率，也确实取得一定成效。随后，村干部看到分工到户已很难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打破这个瓶颈，决定推行“分产到户”，规定每亩上缴多少粮食，剩下的归家庭所有。

1977年，里溪大队选中了6个生产队中的3个作为试点，队员们



中间为林德成

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不用队长敲钟，过去插秧几十个人几天才能插一亩，每年春耕都要插到立夏，现在一人一天就能完成一亩。村民不仅提前完成任务，亩产量也提高了。平均亩产量达到800斤，有的甚至超出了1000斤，第一次跨了《纲要》。农民不仅有足够的粮食上缴，还剩下几百斤自己支配。事后，林德成把这个说成是联系产量责任制。队员们在增收增产的同时，又积极畜养牲畜，开荒种植，村民腰包很快就鼓起来，村里很多茅草房很快就变成了砖房。

里溪人的大胆改革和卓越成效引起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省里特别选择了里溪村作为广东省第一次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会的现场。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等省委主要领导和中山县主要领导均出席现场会，这场解放思想大会整整开了半天，省委有关领导指出：全省要统一解放思想，学习里溪成功的改革经验，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此，广东人的思想框框一下子被打破，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迅速在南粤大地展开。1980年12月和1981年4月，《南方日报》先后刊登了《板芙公社推行田管联产到劳责任制》及《板芙公社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两篇专题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向全省推广板芙经验。此时里溪村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广东小岗村”。

（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100名》）

【点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党充分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高度运用了群众的智慧的生动见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农村政策实现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30多户农民，拉开了农村改革



的大幕，创造了农村改革的历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远在南海之滨的中山县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里溪村的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根据群众意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推动符合历史实际的农村改革模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据原市委书记谢明仁回忆，实际上，类似里溪村的情况已在中山遍地开花。

当时我们向习老汇报中山的工作情况。如板芙公社的农业生产总是上不去，几个大队的领导人迷信思想严重，认为生产上不去是大队名字不吉利的原由。于是把名字都改了，转转运程，有的改为东风大队、长征大队、金钟大队、红旗大队等等。结果，生产还是上不去。当时群众就戏谑说，长征不起步，金钟敲不响，东风不起舞，红旗不飘扬。

后来，有部分大队开展联产计分制，对超产的队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比如说，某农户超产了100斤，那么生产队要六成，余下的四成归农户所有。当时很多群众都是吃不饱饭，有部分农产品能够成为自己的私产，群众都很高兴。这个政策落实之后，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把粪便之类作为农家肥储在院子的缸里，不舍得浪费，定期施洒在农田里。此后，农产品的产量很快得到提升。上述政策在板芙、民众、三角等镇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推广，普遍反映好。习老听到之后，非常高兴，要求在全县推广。

（摘自《中山党史》2013年第2期）

正是由于党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吸收了群众实践经验中的有益部分，先行先试地开展一系列的改革，才使中山县，乃至全省的广大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节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拜群众为师是手段而非目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能否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能否民主纳言，择善而从。邓小平同志强调：“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不充分发扬民主，意见不能充分发表，愿望得不到充分表达，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被挫伤。因此，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对群众意见要耐心倾听和诚恳纳言，切实做到博采众长、集思广益，问策于民、求计于民；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发挥集体的智慧，做好协调和磨合。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句俗语也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对群众提出来的好想法和好意见要给予表扬，大胆采用，形成集思广益，和谐共事的良好氛围。然而，即使群众的意见是刺耳的或不合理的，我们也要平等沟通、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毛泽东就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不合理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发生了雷击打死人的事故。当时有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中发现了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案例】

中山县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纪实

中山县早在1952年夏季，就在农村部署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时，全县还有部分区乡尚未结束土地改革的复查。中共中山县委在已完成土改复查的区乡先行一步，布置由搞改革转向搞生产，宣传贯彻中共中央1951年12月发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发展互助合作和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刚刚分到土地的贫雇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互助组发展得很快。1952年5月，第四区张家边乡党员黄开串连8户人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黄开互助组。仅仅半年，到1952年底，全县临时互助组已在各乡村星罗棋布。尽管大部分仅是暂时组合的帮工组，但已有一部分选出了组长，成长了骨干。而且，上报为常年互助组的也有127个。

当时，区、乡、村干部对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满腔热情，但做法简单化而且期望过高，以为可以一呼百应、一蹴而就。1952



1962年，郊区公社柏山大队正在夏种插秧的场面

年秋，第五区上栅乡等部分乡村曾经采取“大编组”的方法，由干部圈定谁和谁搭配、哪几户人编在一起组成互助组。有的干部还认为农民按自己原有习惯、找亲朋好友帮工互助，不算是互助组。这就使部分农民产生顾虑。第五区官塘乡的农民吕成，被邀到区里参加互助组座谈会，跟他一起互助的农民却嘱咐他，“到区里开会不要说我们办了互助组”。因为村里农民以为“称作互助组，就要一年到晚为每件农事互助”，并且还“订出一套纪律”，要评分记工，长期互助下去。因此，怕不自由，怕吃亏，怕承认了是互助组就惹上麻烦，以后散伙时“得个臭名”。

中共中山县委领导认为：农民这些顾虑和误解，对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妨碍。1953年夏收前，县委组织各党员干部扎根农村，开展深入调研，研究如何引导农民在原有互助习惯基础上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经过调查，县委得到三点启发：

1.中山县的农村一直相沿有互助帮工习惯，说明农民对互助合作有内在需求。旧有的互助习惯有多种形式：一是“大里捞”。这是中山的本土方言，即在一段农事季节中“捞乱做，不计数”，但各人大体记个肚皮账，一工换一工。好处是能赶工夫。几家合伙“大里捞”，就不用担心没钱雇散工。还有一个好处是，来帮工的都是亲朋好友，有伴有兴趣，比聘请散工做得细致用心。二是工换工。它同“大里捞”不同之处是，并非“捞乱做，不计数”，而是人情还人情、数目要分明。双方做完工就算账，少出了工数的一方立即按当时当地市价支付工资给对方。三是“搭牛脚”，即人工换牛工。一般是没牛户给有牛户做二至三个工，吃点亏，待有牛户把自己的田犁完之后，借回一天牛工。四是“合艇”，沙田地区缺艇农民在割禾期间三五户合伙租艇使用。艇租是按季计算，对每户来说比较节省。



由于合伙租艇要商量安排各人工作先后次序，而大家都要赶工夫，因而便捎带着合伙割禾，工换工互相帮助。

2.旧有互助习惯有它的好处。一是如上所述能赶工夫，解决雇工的困难；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耕牛、农艇缺乏的困难；三是在有感情的亲朋好友基础上互相帮助，简单易行，无束缚，而且人多兴致高，做起工来更用心。所以旧有的互助习惯为广大农民所喜欢。

3.旧有互助习惯也有缺点：一是由于不固定，不但谈不上按各户生产需要合理排工，而且有时功夫紧急需“大里捞”时却找不到人相应合伙，便会误了农时；二是讲究吃喝，习惯上雇散工有所谓“睇钵头”（落不落力做工要看饭菜好坏），而帮工互助没有算工钱，农民认为应比雇工时吃得更好才对；三是帮了便完，无商量，对提高劳动效率及增加生产作用不大；四是“搭牛脚”等对缺牛、缺农具的贫苦农民总要吃点亏。

在调查研究中取得上述三项认识，中共中山县委对当时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作出实事求是的政策，提出“在原有互助习惯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口号，明确宣布几项规定。一是农民旧有的互助习惯可以提倡，要纠正瞧不起农民旧有互助习惯的观念。在帮助农民将简单帮工组提高时，不限名称，由农民自己决定，不必硬性规定称为互助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顾虑。二是提倡在原有互助习惯的基础上固定下来，但以小型为原则，3—5户即可，不要贪大求全，严禁大编组，以便排工、算账、调配劳力等工作简便易行。三是选出组长，有人牵头，有事便于商量，便于领导。四是实行监督易行的记工、算账制度，使能做到互利。五是提倡节约，规定便饭招待，或各人吃各人的饭，反对浪费。

中共中山县委的这些决策，《南方日报》作为好经验在1953年7

月23日加以详细报道，向全省推广。

（摘自《中山党史》2011年第4期）

【点评】

农业合作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历史地看，农业合作化是一项全新的政策，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各级党委政府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验，推动农业合作化政策在各地的落实。

具体到中山而言，农业合作化虽然在初期发展迅速，但由于部分群众的担忧和顾虑，发展后劲不足，制约了互助组向初级社、高级社的跨越。中山县委扎根基层，深入调研，决定放弃对政策的生搬硬套，向人民群众取经，在传统互助习惯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走出了符合中山本地实际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奠定了中山在改革开放前作为广东省农业大县的地位。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八讲

依靠群众 自我服务

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90多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葆青春活力，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因为党能够充分认识到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能够依靠群众，团结带领群众共同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就在党能不能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能替代、否定和忽视群众，必须永远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

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依靠群众，将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如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与土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我们不能忘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不能忘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只能归于人民并造福于人民。毛泽东曾强调：“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

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全党同志都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认识脱离群众的危害，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唯有以更加鲜明的群众观点，增强群众观念；以更加坚定的群众立场，维护群众利益；以更加丰富的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关系，才能从群众中获得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力量源泉。

第一节 船头坐得稳 不怕风来颠

党员干部本身都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来自人民，靠人民哺育。如果自以为入党了，走上领导干部的岗位，就可以事事比群众特殊，高于群众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党员应该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谦虚做人，和周围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员无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党龄长短，都绝不能搞特殊化，绝不能做特殊人，凌驾于群众之上，要甘做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党就采纳刘伯承同志的建议，确定红军中的“司令”称呼后面再加一个“员”字，将旧称呼“护兵”、“勤务兵”、“伙夫”改称“警卫员”、“勤务员”、“炊事员”，表明了革命队伍中不论职位高低，每个人都是普通一员。1959年，毛泽东同志又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警示所

有共产党员时刻牢记自己是为着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普通一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一直倡导党内互称同志，并且以普通一员来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在革命战争年代，环境十分艰苦，但党员干部就是依靠和群众的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爱戴和信任，才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问题屡有发生，新的形势要求共产党员更要自觉把自己作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和克服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团结和带领群众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案例】

人情冷暖看拆迁

城市居民的房屋拆迁工作，是一项老大难的事情。有关人士认为，政府最难搞的两项工作，第一是计划生育，第二是拆迁工作。

难以平衡的市民心态

市拆迁办阮忠东副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房屋拆迁工作说到底还是利益进行分配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社会 and 这个城市居民的整体利益，也涉及到被拆迁人的个人利益、终身利益问题。中山的绝大部分市民具有全局观念，他们素质普遍较高，向往城市文明，希望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但是，总有个别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成了难拆户，即“钉子户”。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最难满足难拆户心理的就是超标准补偿问题。这些人好像要借拆迁工作大捞一把，对政府的法规视而不见，不识惠民工程大局，以满足个人贪欲为要事，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拉也拉不动。他们心理较为顽固，认为“好大一个社会，不能亏了

我一户”。“钉子户”中的公房住户，由于绝大部分都是困难户，住的都是政府所优惠的解困房，有的两夫妻都是下岗工人，上养老下育幼，家庭经济相当拮据；有的原来住40平方米的，政府都要帮他们调换为50多平方米，可是有的人还不满足，要求住上80多平方米，说自己有老人，有小孩，50平方米不够用了；有的原来住楼上，要调为住楼下，原来住三楼的，要调为住二楼，说自己家里有老人，生活不方便了。大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的心理。对于私产户，有的由于家庭条件好，自家有大院，有两三层楼台，装修也豪华，要是拆了他们的家，有一种吃亏心理。如果拆迁户居住的是祖上的老屋，一些年龄较大的户主，由于其对先辈的家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极不情愿拆迁了它，否则大有对不起列祖列宗的“忠孝”之心。一些房主为华侨的，房屋由其在中山的亲戚管理，由于他们本人不在中山，因此，一部分人以屋主远在国外为由，要价高，“缠”住政府不放。有的被拆迁户，兄弟姐妹多，房屋产权不清，因此趁机向政府争“蛋糕”，要实惠，要照顾。

“条例”是最好的法律武器

拆迁户复杂多样的心理，就像一个打翻的七色板，可以搅得满地花样。去年（2001年），我市依靠法律手段拔掉了拆迁工作中的几个“钉子户”，在保护拆迁双方合法利益的同时，也让一些市民从事实中领会到了城市拆迁工作的重要性。

阮忠东对记者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时限性很强的工作。我国重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于去年（200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它为我们的拆迁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武器。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各种行政的民事关系。新“条例”规定的房屋补偿方式多样，可操作性也非常强，拆迁补偿方式、标准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

房屋产权调换。所以，认真掌握新条例，为加快我市的民生工程建
设，完善城市功能要素，提升我市的城市品位，依法实施房屋拆迁，
维护房屋拆迁双方合法权益都很有必要。

“温暖”手段令人满意

早些年，我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斐然成绩。市政府城市房屋
拆迁政策相对全国的某些地方来说更为宽松，在对待孤寡老人、残
疾人、复转役军人等几类居民，从政府的角度出发，都给予了特殊
的照顾。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市民均表示，我市政府部门的工作始
终贯穿着博爱精神，在房屋拆迁工作中也是如此，以诚待人，以情
感人，以理服人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处处体现了亲民、爱民、便民、
为政的政策温暖。

去年（2001年）10月份，市拆迁办在工作中遇到了我市某位刚
刚劳改释放的人员——因为他离了婚，原来的房屋被法院判给了前
妻，他出来之后一直没有住房。市拆迁办在拆迁他前妻的房屋时，
按说对他可不予照顾和安排住房。但是，作为一个改造过的社会公
民，如果对他依然冷眼待之，将他们的困难踢给社会不理不管，有
可能使他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于是市拆迁办给予了他照顾和住房
安排。

去年（2001年）底，市拆迁办因某道路扩建工程，遇到了某残
疾军人的店铺需要拆迁的事情。这位残疾军人平日有政府各方面的
照顾，其私自设置的店铺可以拆迁，拆迁之后不用给予什么照顾。
但是，市拆迁办主动帮他在街口建起了一个漂亮的店铺，让他继续
经营，并打算在他入住的二楼与地面之间安装一个上下滑轮，方便
他的出入。此事令他非常感动。后来，他主动配合市拆迁部门做好
了搬迁工作，并三次送来上书“事事关心，排忧解难”的锦旗表达
谢意。

市拆迁办认为，这些居民因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推给哪个部门都不好。因为他们的问题最终还得要靠政府来解决。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拆迁方面，他们代表了政府，让市民亲身体会到市政府的一片爱民之心，以加快我市的城市改造步伐，把中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摘自2002年1月6日《中山日报》）

【点评】

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亦要不断进行再建设。为了城市的整体规划，或者为了国家专项工程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对原有建筑房屋进行拆除、搬迁，达到整体的整齐划一或对日益紧张的国有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拆迁具有必要性，但又由于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谨慎处理。市拆迁办在拆迁过程中高度重视群众的合法权益，考虑到受影响群众的各种生活工作需求，作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惠民政策。市拆迁办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无独有偶，中山连续5年被中央综治委评为“全国社会管理优秀市”，实现五连冠，并第三次捧得“长安杯”。从1993年开展全国综治优秀城市评选以来，中山是全省唯一一个连续20年共5次获得该荣誉称号的城市，也是全国17个连续3次捧得“长安杯”的地级市之一。另外，中山今年成为全国首批“无医闹城市”。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正是因为党员干部坚持永远做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从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二节 事成于和睦 力生于团结

真情实感是依靠群众的基础。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有、凭空产生，也不是天上掉下来，更不是凭喊喊口号、嘴上说说、表表决心、写写心得，而是在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摸爬滚打中产生。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群众当亲人，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公仆，带着感情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生存状态，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进得了门，说得上话，访得出情，解得了忧”，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增进与群众的真情实感。只有干部对群众有感情，群众才会对干部有感情，才会理解和支持干部的工作，才会毫无保留地与干部沟通交流，让干部们的工作不走弯路，更快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

把群众当亲人，带着情感融入群众，需要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结对子、交朋友。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对子、交朋友重在沉得下去、交得持久。毋庸讳言，部分党员干部身居要职，有诸多重要工作和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但时间就像海绵，挤一挤还是有的。俗话说，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良好的干群关系是需要时间积累的，而“常回家看看”尤为重要。经常到群众家走走，时常与群众拉拉家常，是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但这在群众心中的分量却是不可估量的。经常性地走访和联系，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的党员干部就在身边，各级党组织就是群众的主心骨。

当前，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凸显和复杂，各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相互交织，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党与群众的联系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干部高高在上，或满足于在办公室里上传下达，或忙碌于文山会海，或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或热心于迎来送往和各种应酬，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对群众在拆迁、征地、教育等问题上提

出的合理诉求，疾言厉色，呵斥有加，说出一些“雷人”之语，既没有对群众的丝毫敬畏，更没有对群众的半点亲情，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干扰、阻碍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为此，要将把群众当亲人作为新时期依靠群众的基本要求和出发点，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群众的各项利益。

【案例】

谢月香做群众工作的自述

我曾长期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1942年，我以教师的身份来到五桂山，白天上课，和群众一起劳动，借机宣传教育群众，晚上给夜校上课之余，还挨家挨户访问，教妇女识字，甚至和妇女积极分子同床而卧，跟她们讲形势、讲理想，做思想工作，培养了很多得力的妇女干部，为党组织培养了许多新生后备力量。

例如，我与我的教育对象余华娇同住同睡同劳动，逐步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特别是1943年冬，她犯了胃病，有几个月时间经常在晚上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呕吐。她家里除了老母亲外，弟弟、弟妇都很忙，照顾不了她，我就整晚照顾她。1944年春节，她又犯病了。要冒险到敌人驻扎的南朗圩才能买到药，而乡下人迷信，忌讳大年初一去买药，我却不管这些，到南朗为她把药买回来治病。



谢月香同志晚年留影

她十分感动，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通过教育，她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搬掉三座大山，取得民族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她认识提高了，也就更加积极支援游击队的工作，她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余华娇家是下中农，有几亩耕田，生活也还过得去。她的弟弟则害怕姐姐支援游击队工作，会招惹敌人，连累家庭，因而常常骂她，并煽动母亲一同阻挠华娇参加工作。我通过照顾好华娇来影响她母亲，使她母亲逐渐转变，不再反对华娇出来工作。另一方面，华娇自己本人也很自觉，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去割草、种菜，家务事也比平时做得更多。把家务做完后，再争取时间去发动妇女，带动妇女们去支援游击队。这样，她的弟弟也不好反对。华娇常常带动妇女给游击队割柴草，堆成一个个大草堆，



五桂山旧地重游，
谢月香（前排左一）
与老战友合影

部队到来时，就挑给部队烧。敌人来扫荡时，华娇发动一批批妇女骨干与集结队员一起去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带领群众上山隐藏后，她就和集结队员回到村里站岗放哨。她还经常为部队送情报，在群众中募捐慰劳品等等。

通过斗争锻炼，在她积极要求下，1944年2月余华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乡里主要骨干分子之一。入党后她工作更加积极，1944年4、5月间，乡里成立妇女会时，她被选为乡妇女会长。

随着游击队连续不断地取得战斗的胜利，整个五桂山的游击区局面也逐步打开。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上级党委决定在五桂山区建立“抗日联乡办事处”，以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征收公粮，训练民兵，培训干部等工作。民主政权成立后，领导山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按原来地租减二成五，即按七五折交租，并把抗日公粮的负担主要放在地主身上。建政前组织了建政宣传队，由黄昌熿任队长，到各乡去演出活报剧、歌咏等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又分别召开了由农民、华侨、开明乡绅、地主等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座谈会，阐明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搞好生产，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一般中小地主看到游击队来了之后，特别是区政权建立之后，没有了盗贼，山区社会治安较好，对民主政府减租减息政策是拥护的。少数大地主很不愿意，但大势所趋，也不敢违抗。减租减息取得了胜利，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山区不但没有饿死一个人，多数还能吃上两餐干饭。

整个山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享受到民主权利，妇女地位大大提高，许多束缚妇女的封建习俗，如妇女不能改嫁、童养媳、娶妾、溺女婴等现象大为减少，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自由恋爱也在年青一代中开始出现。整个五桂山区呈现一片繁

荣兴旺，和睦欢乐的新气象。

（摘自中山市妇女联合会《一个女战士的足迹》）

【点评】

谢月香，原名谢梦娜，中山市南朗镇石门村人，出生于爱国华侨家庭，并于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中山党组织虽然人数不多，力量有限，但正是由于一个个谢月香们放下家庭优越观念，主动放下身段，带着情感融入群众之中，在思想上树立了真正把群众当亲人的观念，设身处地、真心实意地解民忧、济民困、做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认真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信赖。而人民群众在发动起来之后，又反过来保护着谢月香等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群凝聚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如果说早期群众是被动地被党员干部发动的话，而到党群一体化后，群众自主意识空前提升，新气象比比皆是。正如谢月香自述中所述：“妇女地位大大提高，许多束缚妇女的封建习俗，如妇女不能改嫁、童养媳、娶妾、溺女婴等现象大为减少，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自由恋爱也在年青一代中开始出现。”这正是群众自主解决问题的生动写照。

第三节 解铃还需系铃人

从整体上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具体到一个个的群体的时候，情况却要复杂得多。由于利益的驱使，各个群体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矛盾。而这些矛盾有时把党和政府也卷入其中，一个处理不当，就有影响党群关系的可能。

【案例】

嫁在本村却被当成“外嫁女”

我市某自然村发生一咄咄怪事：一梁姓农户2000年刚领到镇政府颁发的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1年起这个经营权证却被村里私自“作废”，梁家五口人突然成了村里的“黑户”，无法分到土地，也无权享受村中土地承包的集体利益分配，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这件事，我几年没睡过好觉，”近日，梁家女主人梁凤玲的兄长梁金带向记者反映了情况。60多岁的梁金带一脸无奈地说，三年来他跑村、镇、市，数不清跑了多少趟，上级都认为其妹和家人应依法获相应分配，也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但村里总以“村民意见”为由拒绝。

事件经过：全家被“除名”

今年53岁的梁凤玲土生土长于这个自然村，1984年与移民到同村的青年梁玉葵结婚。同是农民身份的丈夫梁玉葵在1982入户，由于各种原因，从未享有村民待遇。结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子女，户口也在该自然村，但也与父亲一样成了“外来人”，无田无地。一家人仅靠梁凤玲的一份土地分配收入加上丈夫打杂的微薄收入勉强过日子。2000年1月，土地重新调整分配，梁家五口人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每人的承包份额为0.56亩。当年，他们全家获得了集体利益分配。但2001年村里换届选举后，梁家五口人在年底的分配中突然被“除名”，一分钱没得。三年来，梁家为此生活更趋困难，三个子女读书生活几乎全靠亲戚救济。

除名原因：梁凤玲是“外嫁女”

据了解，给梁家“除名”的最基本原因是“梁凤玲是外嫁女”。知情人告诉记者，根据村民2001年的集体意见，外嫁女不论户口迁

不迁出，都不能享受福利。因为村里有一些妇女，嫁出去了为图村里的集体福利不愿迁户口，这样对村民不公平。梁凤玲嫁在本村的为何也当“外嫁女”看待？一些村民说：他老公不是我们村的原村民，她嫁出去了就是“外嫁女”，当然不能再享受村民待遇。他们虽领有“土地承包经营证”，但大部分村民有反对意见，所以也没用。

镇村意见：梁凤玲要求合理合法

当地镇委镇政府和村委会对梁家的遭遇十分同情，也十分关注，除有关领导出面过问协调外，还派出专门工作组以各种方式做村民思想工作，指出梁凤玲并非外嫁女，因其丈夫早已落户本村，梁凤玲户口不可能外迁，按有关法律法规，梁凤玲一家五口都应拥有村民待遇，不应有任何歧视。但经多次工作，梁凤玲一家的待遇一直无法落实。

村支书告诉记者，这个自然村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为了防止“外嫁女”为图村里福利而不愿迁户口，从而“摊薄”了村民收入。他们这个村里确实也有这种现象，但梁凤玲的情况有别，性质也不同，不能以“外嫁女”看待。梁凤玲目前提出落实家庭四人（不包括丈夫）村民待遇已是大度，且合理合法，村不能以“大多数村民意见”为由推拒。

律师：这个村的做法属违法

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卢金宝律师认为，文中的自然村这种做法没理没据，完全是违法的。梁凤玲一家户口都在村里，为何没有土地分配？没有土地他们以什么为生？况且镇政府已发出了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梁家属合法拥有土地经营权。村里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村民意见来剥夺村民的权益。有关行政部门应责无旁贷，作出权威性裁决，依法为梁家作主，维护村民利益。

（摘自2004年11月21日《中山日报》）

【点评】

外嫁女问题和代耕农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山乃至整个珠三角发展的比较头疼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利益均是引发社会问题的动因。改革开放带来了珠三角的大发展，农村土地也因此不断增值，给村民的红利也水涨船高。是否拥有农村户口，就成为能否分取红利的钥匙。外嫁女问题和代耕农问题便因此而产生。究其实质而言，为群众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当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要求以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展开的时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处理这些问题的头疼之处不仅仅在于频发，更在于无论党和政府怎样处理，总会伤及一部分群众，同时给党群关系带来损伤。毕竟当事的群体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的博弈。要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除了以相关法律法规作支撑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团组织，不厌其烦地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加强宣传的力度，引导各方多包涵，多换位思考。解铃还需系铃人。

当然，做群众思想工作的时候，会困难重重，这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工作艺术和服务水平。下面的案例中，工作方法很值得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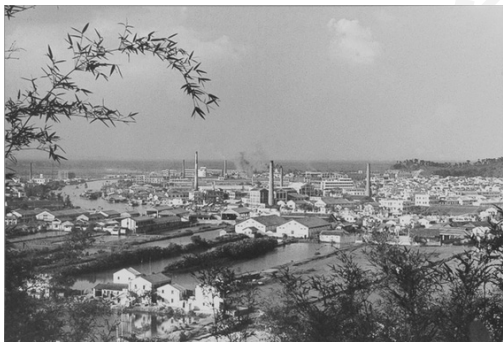
【案例】

狮滘河从圣狮村穿过，留下了弯弯曲曲近6公里长的河道，带来了一定的隐患。2002年村委决定下大力气整治河道，裁直过急的弯道，并为河岸铺上石堤，为此将要砍掉河岸两边的树木。考虑到这是涉及到全村群众的事，村委就“是否砍树”这一议题召开了村民大会。在会上，村民表达了对村委的充分信任与支持，同意

砍树。但是，村干部们也注意到，部分群众还有情绪。他们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又一次在村民中进行了解与调查，最终了解到，不少群众对树有感情，不愿意砍掉。权衡再三，村委决定改为砍掉部分树木。执行以后，河道通畅，风景依旧，广大群众十分满意。

工作耐心细致并且充分考虑群众情绪，促成了圣狮村官信民、民拥官的良好局面。多年来，圣狮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干群关系和团结稳定的社会氛围。全村经济稳步增长，至2003年全村集体资产比1993年增长了近15倍，村里的道路、文化设施、学校、老人福利、企业数目与规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摘自2003年8月31日《中山日报》）



20世纪70年代的狮滘口

狮滘河一如既往地流淌，只是河水更顺畅了，两岸的景色更美了；圣狮村仍是圣狮村，只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已亲如一家，村民的日子过得更好

了。今日圣狮村以鲜活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依靠群众，不是靠口头说说、做表面文章就能实现的，需要党员干部在长期的工作中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逐步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部分群众一时对政策不理解，或者对有些做法不满意，这是正常现象。但绝大部分群众是明理的，是可以说服的，是相信党和政府的。圣狮村党员干部保持平常心态，耐心细致地去做说明工作，争取群众对工作的理解和配合，使地方发展思路转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九讲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18日）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需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是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由于是中学教科书上所提到的，所以一般人也最熟悉。其内容就是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不断地研究，化为系统的意见，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使之化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循环往复，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正确、更生动丰富，继而产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越来越符合实际，工作也越做越好，不断前进。

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具体的党组织或党员个人去讲的，任何党组织和党员，都要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思想上作风上永不脱离群众。思想上作风上脱离群众，就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就滋生腐败。如何使党组织及党员不脱离群众呢？那就是要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要求自己，“打铁还须自身硬”，要不断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

第一节 月有阴晴圆缺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这高度概括了是否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沙溪圣狮曾经的辉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案例】

圣狮：惊叹的繁荣与衰落

58岁的陈文达是圣狮村的党支部书记，提起圣狮村的辉煌岁月，达叔总是一声轻叹，两眼透出愉悦略带亢奋的光芒。

1958年9月，中山县的沙溪、圣狮、象角等十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组建沙溪人民公社。圣狮的辉煌也就在此时发端。

13岁的达叔奔跑在欢乐的人群之中。锣鼓威风，震耳欲聋。鲜花伴着掌声，欢歌伴着笑语，圣狮三千之众尽情宣泄。支部书记陈华晃着1.7米以上的高大身躯，陪同上级来的干部，朗笑着向社员们招手。入夜，村里的发电机“突突”地叫起来，电灯亮了，千家灯火，村子一片璀璨。周边社里的人们跑过来，瞪着铜钱般的大眼睛啧啧称奇。

“那才叫风光！”达叔带我们在村里走了一圈：古榕沐风，河涌漾波，当年的大队部、粮仓、晒场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的大饭堂几经改建但也留下部分遗迹。

达叔说，人民公社成立后，推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经

济体制，圣狮大队在党支部的带领下，选择了种养结合、工副业全面发展的路子，集体经济一片红火。



1963年圣狮大队的晒谷场

圣狮辉煌从1958年持续

到1964年。期间，圣狮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但由于有集体经济的强大支撑，全大队不仅没有饿死一个人，反而用余钱建了许多农田基础设施，办了不少集体福利事业。

对于当年圣狮大队的集体资产，谁也无法一一记起。达叔、村主任阮宪佳和一个叫彭桂源的长者，搜肠刮肚地回忆了半天，也只能说出个大概。

报载，圣狮所积累的庞大的集体资产，包括三机、九站、五场、十厂、一队、百车、百艇、七仓库、一晒场。三机是三台拖拉机，九站是九座装机容量400瓦的电力排灌站，五场涵盖猪牛鸡鸭鹅，十厂是指砖厂、灰厂、碾米厂、造船厂、农机厂、织竹厂、木厂、铁农厂、榨油厂和酿酒厂，一队是一支建筑队，百车是百辆胶轮手推车。此外，还有一艘载重30吨的机动帆船、一艘电船和二十二艘大木船。大队家当总值176万元，平均每个劳力1783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圣狮人富了，并且令人眼热地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圣狮的劳动力每月进账68元，而相邻的有些大队，每劳月收入不到5元。圣狮办起了一座可容纳1900多人吃饭的大饭堂，从1959年维持到1964年，农闲时700人吃饭，农忙时超过1000人，“大锅饭”怎么也吃不穷。大队办起敬老院一所，供养17位老人；托儿所四间，接纳200稚童；幼儿园一所，入园48幼童；自办小学一间，有学生600—700人，



此外，还办有卫生院、广播站、图书馆等。

“1963年是圣狮的鼎盛时期，最红火了。”说完这番话，达叔哼唱起当年久久传唱的歌谣：“学圣狮，赶圣狮，圣狮系革命化的一面旗帜……”

阮宪佳说：“当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说毕与达叔一道哼唱。

万目所向，八方来朝，当年的圣狮一如后来的大寨和小靳庄。视察和检查者一拨接一拨，参观与学习者络绎不绝。国企职工请求来这里务农，城市青年请求在此落户，大学生放弃国家统一分配前来创业。农忙季节，只要生产队开声，即有城里的机关干部、工人和中小學生浩浩荡荡开过来，支农场面蔚为壮观。

“汽车排长龙进村，小孩们乐得整天拍巴掌，”达叔说。

圣狮经验受到高度重视，广东人民出版社派出专业作家久住圣狮，编著洋洋洒洒20万言的《圣狮风雷》。媒体炒得更火，1964年二三月间，《南方日报》连续几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介绍圣狮，贯以通栏标题——“圣狮，全省农村革命化的一面旗帜”，配以社论、领导题字、专访、典型报道、英模材料和巨幅照片。又在二三版展开专题讨论——“富队怎样比、怎样学”、“穷队怎样比、怎样学”。

达叔将当年的报刊资料一一收好，又补充两点：其一，当年的圣狮出了一批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劳模；其二，圣狮组织千人到斗门县围垦造田，开发狮子角3000亩良田。

这两点，足以为圣狮的辉煌历史再添两道光环。

1964年是圣狮大队的坎儿年，是色素的分界点——年初红得发紫，年尾黑得见炭。席卷中国农村的“四清”运动率先在圣狮试点，很快将圣狮的经济大厦摧垮，并且带来血光之灾。

达叔那年19岁，是生产队里一名社员。对于那段历史，达叔怎

么也说不完整，对于大饭堂的干部学习班和支部书记陈华的自杀，他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句。

“太突然了，红的一下变成黑的，谁也没法接受当时的现实。”达叔心有余悸地说，同时在记者的追问下回答了一些他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1964年下半年，由省、县两级派出的“四清”试点工作队开进圣狮，刚开始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清来清去清出圣狮大队庞大资产的性质有问题，然后将党支部、大队部和各生产队的干部集中到大饭堂办学习班。

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大饭堂那边不时有消息传出，什么某人有“四不清”问题，什么圣狮是反大寨的黑旗。在“四清”成果日渐丰硕的当头，又传出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陈华自杀！

陈华死于1964年那个黑色冬季，这个一手创造圣狮经济神话的高大汉子，未能挺过“四清”工作组的拷问。陈华的死，没有太多细节，村人也不愿多说几个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千村民对这个威严的村官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注入了友善的情愫。

红旗变为黑旗，圣狮经济大厦顷刻坍塌。大队的财产该分的分，该卖的卖，该上缴的就上缴。“到1965年‘四清’后期，圣狮几乎所有的家产都卖完了，”达叔不无痛心地回忆道。“机械、船只卖了，发电机也卖了，鸡鸭鹅猪羊通通卖光，卖不了就折价，十斤的猪只当六斤卖。”

圣狮大饭堂也在这个时候彻底了断。当初建饭堂，大队派人拆掉各家各户的院墙，备齐了砖。现在又将饭堂拆除，砖头各归原主，桌椅板凳悉数收回。大队六年之中创办的五场十厂也逐一关闭，一些经济实体土崩瓦解。

陈华自杀后，“四清”工作组并未减轻对其他干部的高压。大



队长阮丙超受到严厉批判、无情打击。经过这场变故，圣狮村好长一段时间无人敢当村干部，支部书记的位子成了“流水席”，你坐一年，他坐两年，谁都不肯长干。据查，从1965—1971年的7年间，圣狮党支部先后换了5位支部书记。

达叔说，那次变故使圣狮一直走下坡路，以后工作没有起色，集体经济每况愈下，越来越穷。村民的精神也受到压抑，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文化大革命”在周边搞得轰轰烈烈，但圣狮却风平浪静，没有一个人出来闹一闹。佛山市的造反派串连到村里，见到一幅衰败凄凉的景象，只能牵着耳朵回去。

精神是一种力量，当初圣狮依靠“大无畏”、“富而进”的集体主义精神，创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模式。当这种模式被彻底否定，这种精神被彻底击垮的时候，圣狮的沉沦便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必然的沉沦中，圣狮磨光了自己的棱角，变得毫无特点，千篇一律，平庸无为。从1966—1977年，圣狮没有办过副业，其间也和全国数以万计的行政村一样，经历过“清理阶级队伍”，打倒刘邓陶的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时常进村，也时常组织社员开会学习，最后搞得大家都很穷，产生一批“超支户”。

（摘自2002年10月3日《中山日报》）

【点评】

尽管昔日独领风骚的繁华不再，但在中山发展史上，圣狮当之无愧的是一面旗帜。“三机、九站、五场、十厂、一队、百车、百艇、七仓库、一晒场……”短短几年间，庞大集体资产的积累，真乃奇迹，让人惊叹，让人敬佩。圣狮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让全中山、全广东，甚至全国注目。然而风云突变，圣狮几乎在一

夜之间成为明日黄花。由兴盛到衰落比翻书还快。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竟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四清”运动，今天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左”倾运动，当时的政策明显偏离了群众路线的方向。错误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有时是毁灭性的。很不幸，圣狮为毁灭的后果买了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毫无疑问，陈华是引导圣狮走向辉煌的掌舵人，可惜他却在“四清”运动的狂风暴雨中陨落了。群龙无首，他的陨落成为圣狮最大的不幸。反观后来引导集体经济走向辉煌的吴仁宝和李汉章，都曾经遭受过“四清”的冲击，但他们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改革开放后，圣狮又重新起步，再度发展，和周边相比，虽然不再独领风骚，但也算是灿烂群星中的一颗。圣狮村的发展变迁，直接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策对基层社会的管治格局、思想和经济成效带来的截然不同影响。同时，通过了解圣狮村的兴衰起落，在群众利益的审视下，检验出了不同政策的正确与否。好的政策，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必然是符合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带来新的推动。反之，不符合群众利益和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发展需求的政策，必然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影响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第二节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是



最直接、最深入地与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也是表达民情民意、凝聚和引导人民群众、获得民心的平台和渠道。此外，基层党组织还影响着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外围团队。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强不强，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成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健全、健康的发展，是巩固党的发展的基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曾经活跃着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们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青年组织——青年突击队。他们不畏艰难，敢于拼搏，敢于创新，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贡献了青春力量。他们的团队，也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党组织、群团组织以及青年人争相学习的榜样。

【案例】

永远的青年突击队

在中山，曾经出了一支享誉全国的青年突击队。1955年，粤中区工委工作组为该队专门写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上报党中央。9月，毛泽东主席看过此文之后，大加赞扬，写下了著名的“四最”按语：“这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她的辉煌，她的精神，几乎影响了当时中山的一代青少年。

7月30日，记者冒雨来到民众镇沙仔村，踏上当年的青年突击队洒下血汗的土地，寻访了老队长梁碧南老人。

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青年突擊隊

（粵中區粵中區工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見《華南青年報》第十六期）

本書編者按：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參考。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這樣。希望各地的黨組織，協助青年團組織，並做研究如何特別發揮青年人的力量，不要給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點。當然青年人必須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學習，要虛心聽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辦各種有益的活動。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較多的，他們往往壓抑青年的進步活動。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績以後他們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寫了這種情況。對於保守思想當然是不應當妥協的，那末好漢，就來試試看，成績出來了，他們是會同意的。

《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

成立青年突击队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民众镇沙仔村）有大片低沙田。这里地处中山市东北珠江河流出口，标准水位在—0.4米以下，自然条件极差。每年早晚两造均遭遇渍水内涝。全村仅有农家125户，劳动力230人左右，稻田800余亩，农业生产处于落后状况。

1954年冬，新平乡久旱未雨，咸潮肆意侵袭。由于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一些农民存在着观望的保守心理。如何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力量，积极带领社员们战胜自然灾害，获得农业丰收，使社员走上温饱之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此时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在80天内完成6000艇入泥任务，挖河泥来填高低洼地，以解除其对早造生产的威胁。这一任务相当艰巨，一些社员为此打起了退堂鼓。社里每天出工的人数只有30来人，远未能完成生产任务。团小组长梁碧南提议，以团小组为核心，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撑泥”行动。这个建议得到了社委和青年团粤中区工委工作组的支持。几天之后，工委组织部部长陈诗博与梁碧南商量组建一支青年突击队，采用“常规战”与“突击战”相结合的办法，在生产繁忙和薄弱的时候，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

12月中旬的一天夜晚，青年突击队成立了。会场上，士气昂扬，36名青年集体签名，入队宣誓：“为革命时刻准备着：突击！……”队员中，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不过24岁。梁碧南被推选为队长。

突击队里的领头羊

梁碧南，1929年出生于中山县新平乡（今民众镇沙仔村），5岁时成为孤儿，9岁开始给人家看守鸭鹅，14岁时就跟从师傅学习搭棚。新中国使贫苦的他“有了地位，有了衣食”，因此他生产热情特别高，一心要让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突击队成立以后，梁碧南发扬“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拼搏”的



青年突击队精神，带领青年团员们冲锋陷阵。为了提高入泥效率，他决定在队里开展劳动竞赛。为带个好头，梁碧南每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入泥量居全队第一。他的精神鼓舞了其他队员，同时也影响了社员们，在全社掀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

往事历历。回想当年的突击队，梁碧南老人深情地对记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除“三化螟”一事。那次旱患解除后，秧苗出现了“三化螟”虫害。一些村民说：“禾苗无虫，天上无龙。”认为害虫天生自来，不用担心。他没有理会那些人的话，而是积极带领队员们进行灭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许多村民纷纷效仿，一道加入灭虫行列，从而战胜了第一代“三化螟”对秧苗的威胁。

“那时有些人比较保守，搞生产的同时，还要向他们进行必要的宣传，”他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在他的带领下，有困难他们上，有苦头他们来啃：田地缺肥，他们堆禾秆积肥料；为防止农作物冻坏，他们深夜里冒着严寒到田里给农作物盖禾秆、打包；平日里，队员们还积极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大胆使用新型的除草农具，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农田增产增收……青年突击队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社员这样称赞他们：“青年突击队顶呱呱，碰到石头当蔗渣。落雨当冲凉，月光当太阳。”

永远的“铁塔”

与梁碧南老人同行，看他指点当年青年突击队战斗过的地方，记者不时被老人的激动话语感动而心潮澎湃。阵雨如鼓点落下，记者要为他撑伞，被老人拒绝。他说：“这点雨算什么！你们用伞吧，我几十年都习惯了。”仿佛他就是雨中的铁塔。

我们很难想像，梁碧南现在是73岁的老人。他仍然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几十年来，他当过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后作为

镇干部退休在家。老人儿孙满堂，生活算不上富裕。谈到现实他很有感慨：“相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生活也好多了。但是一些人吃不了苦，缺乏拼搏精神。其实，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有困难，只是每个时代或者每个人的困难不同而已。当你去面对或者克服这些困难时，应该要有吃苦的精神。”

大浪淘沙，能够彰显的是一个时代最为闪光的东西，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它。采访中，好些上了40多岁年纪的中山人对记者说，他们几乎人人都能道出曾经的、永远的“青年突击队”。那是中山人民的光辉历史之一。毛泽东同志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四最”按语，在中山曾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丰富的精神食粮。

梁碧南老人有个17岁的孙女，现在广州读中专。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村里的老一辈人常向现在的年轻人提起他们的这段光荣历史。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无法体验那个时代的艰苦，但我能想象，他们为了千方百计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而如何战胜困难的动人场景。我会常为此而无比激动。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去应对艰难，面向美好的未来。”

（摘自2002年8月4日《中山日报》）

【点评】

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鲜活经验，为现时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来了启示。当年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员年纪轻，经验浅。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农村的艰苦环境里，面对繁重的生产任务，年轻的队员没有退缩。在劳动中，生活中，队员始终发挥着先锋队的带头模范作用。（一）先进的觉悟。全心全意为村里群众服



务，千方百计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是队员施展能力、开展工作的根本动力。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就理清了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二）先进的生产力。突击队注重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和理论知识。他们向大自然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敢于在尝试中探索、创新，提高了整支队伍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队员不受保守的思想和生产方式约束，成为研究、推广新技术的代表，对农村的生产效率产生直接的作用。基层组织在群众当中树立威信，得到信任，并不是靠做表面文章或者做形象工程来实现的。必须注重实干，使群众的生活得到真正的改善。（三）创树典型，以点带面。队员以“先进分子带动一大片”，肯吃苦，抢着吃苦，用自身行动带动村里的青年和群众，以突击队良好的风气带动民风、社会风气的建设。

第三节 打铁还需自身硬

关于党员干部如何体现出应有先进性，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父母那样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

中共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骄人的成绩，关键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稳固的阶级基础，是党执政稳固，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在党长期执政后，由于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在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多元化价值观时，淡薄了

党的优良作风，逐渐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脱离了党执政的基础和发展的原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对党员干部的品行、能力、作风、效率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奉行群众路线，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作风，才能通过改进作风凝聚群众，获得民心，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建设要注意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思想建设，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服务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党的重要理论学习，常常照镜子，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通过实践工作中的对比分析，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二是加强作风建设，也就是端品行，正衣冠。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建立与人民群众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同舟共济的朴素感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八项规定。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注重学习和积累，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先进分子学习，学会运用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理论新方法，提升科学决策能力和处理实践的能力；在实践中提升服务群众的技巧，善于总结和把握规律，学会归类和分析，用经验指导行动，改进工作的方式；注重创新，不断探索做好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载体。在新的时代要求下，研究群众的心理规律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行为模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熟悉的形式做好宣传、教育、服务。四是加强制度建设。按照党章党纪，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制度来约束人，以制度来规范行为。

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服务团队，是中山市党员干部学习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高效、有序、规范、人性化的工作，为群众办理出入境事务带来了便利，也为建立健全行业规则，促进行业稳



步、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案例】

做群众满意的警官

数十项荣誉加身，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成为市公安局乃至全省、全国出入境管理系统的一面旗帜，而高高扬起这面旗帜的正是担任出入境管理科科长林志昂同志。

群众的满意源于他真诚出色的工作和服务，也源于他对入境管理工作的执著追求。

改革护照管理

我国出入境管理一直沿袭“管理、控制”的计划模式。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模式显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面对出入境管理的这种被动局面，林志昂提出了“变管为服务”的观念。一句话：以群众的需要作为工作的标准。

基于这样的理念，林志昂带领民警们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决定首先在护照办理上动大手术。在征得了上级的同意后，于2001年4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常住人口凭身份证、户口簿申领因私护照。

增加透明度

1999年，出入境管理科在全省率先推行了警务公开工作。把出入境管理的有关政策、办证程序、办证制度、办证结果全面向社会公开。

此外，出入境管理科在办证大厅安装了三套19英寸电脑触摸屏和IC卡智能查询申请多功能系统，使办证群众可即时查询申请办理状态。针对群众十分关注的出境配额问题，他们将往港澳定居的本年度及本月份出境最低分数线、本月省厅批准出境人数及名单、往港澳探亲和非公务签注的配额及使用动态，每天都在滚动电视屏上

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他们还开发了电话自动传递查询信息综合系统，设立了国际互联网网页，使群众能随时随地动态查询申请审批速度、审批结果、最新的政策法规，以及进行投诉和传真索取出入境有关资料信息。

前年（2000年），省公安厅把该科列为全省警务公开示范点，向全省推广经验。

做星级服务员

本着服务于民的观念，林志昂与民警们在工作中转变姿态，放下“架子”，抛开“特权”，不以“管人者”自居，杜绝“冷、硬、横”，一切为群众着想，一切为人民服务。

由于受办公条件限制，出入境管理科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办证大厅，办证群众只能在一个通道上排队等候，地方窄，窗口少，冬冷夏热。为解决这个问题，林志昂积极奔走，取得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拨款扩建了宽敞明亮的办证大厅。新大厅设有13个办证柜台，实行低台敞开式办公，安装了自动叫号系统，配备了空调、座椅，并免费提供茶水。办证群众无须排队等候，而是坐在休息椅上等待叫号。一个繁杂的申办过程变成了一次愉快的休闲经历。陈根楷市长在视察后，幽默地形容为“一流的设施，星级的服务，大排档的收费”。

树强警形象

为了从严治警、依法治警，加大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消极腐败现象，出入境管理科制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一是办证签证实行微机化规范办理和技术监督，从审批程序上堵塞漏洞。将出入境管理系统直接与省公安厅电脑联网，办证的全部过程完全处于省公安厅的规范监督之下。同时，把办证过程实行分组流程电脑监控，各岗位民警使用自己的专用电脑和专用密码，



材料处理全部有电脑记录，上一环节未作处理，下一环节无法对申请进行操作，使工作环环相扣，互相制约。二是加强内部管理。该科明确规定：民警不得私下与办证群众见面，调查材料必须两人以上进行；不得收受群众任何形式的礼物；民警没有特殊情况不得私下到领导家串门；民警亲属不得从事与出入境管理直接相关的行业，也不得到办公场所找民警办事。自1998年以来，全科民警共拒礼拒贿30余人次，金额达10多万元，未发现民警有违法违纪的行为。

群众的满意，是出入境管理工作向人民群众作出的最大承诺。林志昂和他的同事们以服务为本，做好做实每一项工作，给全市人民一个又一个满意的答复，市民们评选他为“中山市十杰市民”。群众的赞赏，向人们展示出一位优秀人民警察的风采。

（摘自2002年7月18日《中山日报》）

【点评】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每天需受理审批数百群众的出境申请，每天为数百群众提供咨询和解答服务。作为面对群众的一线工作人员，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林志昂，带领他的同事，“以群众的需要作为工作的标准”，找准定位，立足本位，开拓创新，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服务型组织的转变，实实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实惠。回顾林志昂和他的团队为改善出入境管理工作制定的措施：一是深入研究，化繁为简。简化审批流程、实现办理事项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群众因办事需要提供的资料和到场的次数，方便了群众办理出入境申请。二是开诚布公，增强互动，做好信息公开。出入境管理的审批名额、有关政策、办证程序、办证制度、办证结果全面向社会公开；群众通过信息化系统，可随时跟踪办件进度，查阅相关规定和资料，如果不满意还可以进行投诉咨询。出

入境业务信息的有效公开和传播，满足了群众对政府机构具体政策、办事效率、服务流程等的知情权，加强了群众的社会管理的参与度，尊重了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三是角色转变，以民为本。由管人者到服务者，思想的转变很关键。一旦以服务群众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就能做得更贴心和周到，更容易让群众放心、满意。四是建章立制，强化监督。“无规矩不成方圆”，应用制度治理行为和品德。组织内部办事有章可循，则处理业务职责更加分明、过程更加规范。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消极腐败现象，建立起清正廉洁的队伍。

这些综合措施的制定，反映了中山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党员干部积极的行动，改善了工作的整个大环境，实现了群众工作的新跨越。这些综合措施反作用于团队，使整个团队在服务群众工作中更具备战斗力。

无论是基层的党组织，还是具体到基层的每个党员干部，在修炼自身，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内部环境。作为基层的分子，时刻与周边社会的大环境紧密联系着，互相产生作用力。置身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与时俱进，学会观察和收集意见，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政策和调整自身，再反馈到外部环境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始终以开放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在加强自身建设和实行管理、服务中取得一个平衡。



后记

在中山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伊始，《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一书适时出版了。这是一部立足中山、取材中山，将党史理论与中山实践相结合的图书，它的出版将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营养，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

2013年9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山市委办公室策划出版一本有关群众路线的读物，以促进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作为市委各职能部门中唯一带有宣传教育研究的部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当仁不让，广泛收集有关中山党史材料，加班加点，筹划本书。本书力争做到“三个突出”：一是突出解读党史理论的权威性和逻辑性，二是突出中山实践的基层性、真实性、生动性和代表性，三是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和指导性。

11月，书稿初成，命名为《从中山党史看群众路线》，直奔主题，态度鲜明，一目了然。12月，又数易其稿，图文并茂，最终付梓，不负所望。

在本书由编写到出版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市委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市委组织部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鼎力支持，对书稿的编写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同时还参与了对书稿的修改和审核，最后又将此书列为全市党员干部的学习参考用书。本书编写组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4年3月18日